

#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8-91

2008年12月17日

\*\*\*\*\*

## 關於民主與普世民主的相關思考

肖黎朔

不久前，在各種報刊、雜誌和互聯網上，各種研討會、報告會上，關於普世價值、民主和普世民主的討論十分熱烈。美國乃至全球金融危機的發生，使這一討論和大家對這一討論的關注被沖淡。但隨著美國金融乃至經濟危機在全球的蔓延，人們在尋求全球這一重大經濟現象的深層次根源時，卻很自然地又與普世價值、民主和普世民主聯繫在一起。

### 一、關於探討民主與普世民主的重要意義

1850年，馬克思在《新萊茵報》發表評論，批駁英國作家托馬斯·卡萊爾“不管我們怎樣設想普遍民主，它是我們這個時代必不可免的

事實”的觀點時說：“民主是什麼呢？它必須具備一定的意義，否則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問題在於確定民主的真正意義。如果這一點我們做到了，我們就能對付民主，否則我們就會倒臺。”<sup>1</sup> 這充分說明，研究、弄懂民主問題並區分各種不同性質的民主，具有極端重要的意義。

1917年，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明確指出：“民主是國家形式，是國家形態的一種。”<sup>2</sup> 我認為，這一定義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民主是國家形式，是指民主意味著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民主是國家形態的一種，是指民主在實質內容上是在一定的階級和有階級的社會裡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一部分居民對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統的使用專政。

遵循“民主是國家形式，是國家形態的一種”這一理論邏輯，我們還可以從下面列寧在關於國家的相關論述中，進一步認識探討民主問題的極端重要性。1919年7月11日，列寧應邀到斯維爾德洛夫大學作了關於國家問題的講演。他在這次演講中開始便說：“國家問題是一個最複雜最難弄清的問題，也可以說是一個被資產階級學者、作家和哲學家弄得最混亂的問題。”<sup>3</sup> “這是全部政治的基本問題，根本問題”<sup>4</sup> “這個問題所以被人弄得這樣混亂，是因為它比其他任何問題更加牽涉到統治階級的利益（在這一點它僅次於經濟學中的基本問題）。國家學說被用來為社會特權辯護，為剝削的存在辯護，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指望人們公正無私，以為那些自稱具有科學性的人會給你們拿出純粹科學的見解，那是極端錯誤的”<sup>5</sup> 他還說：對國家問

---

<sup>1</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04頁。

<sup>2</sup> 《列寧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6頁。

<sup>3</sup> 《列寧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9頁。

<sup>4</sup> 《列寧全集》第37卷，第60頁。

<sup>5</sup> 《列寧全集》第37卷，第61頁。

題“必須再三研究，反復探討，從各方面思考，才能獲得明白透徹的瞭解”。<sup>6</sup>

當前，國內外意識形態領域在民主問題上的爭論，本質上都是從民主是國家形式和國家形態的一種這個層面和內涵上展開的。本文所涉及的民主，也主要是從作為國家形式和國家形態的一種而展開的。在探討民主之時，有時可能會涉及與民主相關的自由、人權等概念。

今天，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政治多極化初顯端倪，科技革命日新月異，各種新機遇新挑戰層出不窮。在這樣一種情勢之下，我們又面臨著“全部問題在於確定民主的真正意義”和“必須再三研究，反復探討，從各方面思考”民主“這個時代必不可免的事實”。

一是從國內看。改革開放 30 年來，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與輝煌。與此同時，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也有得到廣泛公認的發展與進步：我們黨帶領人民積極探索適應時代潮流、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道路，堅持並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人民的各項民主權利得到保障，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得到鞏固，等等。我國成功舉辦 2008 年奧運會及殘奧會、神七載人航天飛船成功發射並返回等舉世公認的鉅大成就，無疑向世人展示了我國日益增強的綜合國力，從一定意義上講，也充分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優越性，並使其具有了一定的世界意義。例如，在奧運會開幕前夕，一位美國學者便驚嘆我國各項準備工作的周密和完美程度：“人們不得低估中國的意識和能力，特別是當中國全民一致、共同努力的時候”，“北京奧運會的信息是，中國的政治制度不僅使其可以遊刃有餘地化解國際事務危機，而且，‘中國道路’甚至應當認為高於民主制度。中共堅持不懈的努力無疑將會帶來持續的經濟增長、確保政治穩定並且產生重大的全球支持”。<sup>7</sup>

但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與經濟社

<sup>6</sup> 《列寧全集》第 37 卷，第 60 頁。

<sup>7</sup> 愛德華·弗里德曼：〈北京奪金牌〉，《韓國時報》2008 年 8 月 4 日。

會發展的要求還不完全相適應，還需要我們繼續深化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努力探索社會主義民主的實現形式，不斷擴大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這是因為，隨著我國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我國社會日益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各種不同的利益群體越來越期望黨和國家能為其提供更加有效、暢通的利益表達機制和利益博弈機制，維護和擴展自身的經濟利益，深化政治體制改革逐步成為各個階層普遍的政治訴求。隨著社會各階層發育漸趨成熟，各種不同的政治訴求也正在沿著兩個根本不同的方向演進：一是積極借鑒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有益成分，積極穩妥地推進我國政治體制改革，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繼續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道路，進一步鞏固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一是希望建立和實行西方民主政治體制，在我國全盤推行私有化，與西方社會“全面接軌”，讓資本甚至讓國際壟斷資本在我國“當家作主”。在這其中，我們也必須充分看到，希望學習借鑒西方政治制度，來糾正或者改變中國現行體制中的一些弊病和不足的絕大多數其用心是好的，但對於其中重大問題的認識卻往往不甚清楚。而那些主張與西方社會“全面接軌”，讓資本甚至讓國際壟斷資本在我國“當家作主”的人是極少數。但對於這極少數人的能量我們卻不能低估。

二是從國際看。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壯大和綜合國力的明顯增強，國內外敵對勢力對依靠“硬實力”在我們國內要達到他們目的的希望越來越渺茫。因此，他們越來越把希望寄託在運用包括民主、自由、人權和新自由主義等“軟實力”上。2008年8月，我們在歐洲訪問時，與英國國家戰略研究所負責跨國威脅和政治風險事務的負責人交談。我曾請教說，能否用簡潔的語言告訴我們，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是什麼？他本不願回答，後來在我們執意追問下，他說，可以用這樣簡潔的語言表述：中國若“硬實力”崛起，美國則十分歡迎；中國若“軟實力”崛起，美中之間將可能發生直接全面的激烈衝突。我認

為，他的回答意味深長，值得我們認真思考。我還認為，他所說的“軟實力”，主要是指包括政治制度、文化觀念、發展模式和社會價值觀念，當然也包括民主、自由、人權等這些政治意識形態。

長期以來，國內外、黨內外都高度關注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特別是某些西方國家對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異常“熱心”，給我們開出了各式各樣的“藥方”，總是希望我們也實行“一、二、三、多和‘兩桿子’”，即一個總統、兩院制、三權分立、多黨制和新聞自由（筆桿子）、軍隊國家化（槍桿子），妄圖把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引向全盤西化的道路。

江澤民同志曾明確指出，目前的經濟全球化，是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化。我們國家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的又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所以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中，要特別注意防止國內外資本利用各種形式對人民政治權力的侵蝕，譬如，一些地方和單位特別是基層民主選舉過程中出現的“賄選”現象，尤其在西部偏遠地區，國外資本已經通過各種非政府組織等形式向我們的基層民主選舉滲透。這值得我們高度警惕。西方敵對勢力不斷攻擊我們不搞政治體制改革，原因就是我們搞的政治體制改革與他們寄予“期望”的政治體制改革截然不同。他們所希望的改革，目的就是要從根本上顛覆共產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實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對此，我們要保持高度的警覺。當然，我們反對照抄照搬其他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並不妨礙我們對其屬於人類文明發展成果的有益成分的吸收和借鑒。

三是從理論界到人民群眾的認識和理解看。由於民主及自由、人權等與國家的發展前景和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所以一直是理論界和人民群眾關注的熱點和焦點問題之一。近年來，關於民主及自由、人權等問題的學術論文和專著汗牛充棟，這既為我們深入研究這些問題提供了較充足的資料，也使得在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方向性認識上

產生了分歧。如，在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問題上，學術界就分為本土派和引進派，這兩個派別的區別不在於要不要民主，而是在於民主是否具有普世性尤其是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否具有普世性，民主的存在是否要以資產階級的“三權分立”、“多黨制”為前提等等。這一系列問題，都是攸關中國民主政治建設進程的路徑、方向和前途的重大問題。我國社會具有複雜性、利益主體具有多元性。而利益主體越是多元，各種呼聲也就越是多樣。在廣大幹部群眾中，對民主本身的理解，也出現了多樣的認識及多樣的認同。比如，一說“民主是個好東西”；二說“講民主是個好東西，但不是說民主沒有問題，沒有局限性”即說“民主是個不壞的東西”；三說“民主是個好東西，但搞不好是個壞東西”；四說：“對當代中國來說，人民民主是個好東西，資產階級民主是個壞東西”。這四種說法，都各自有著不同的認同群體，但哪一種或幾種更為科學呢？

最近一個時期，理論界和媒體上關於民主、自由、人權是否屬於“普世價值”的爭論比較熱烈。持贊同態度的人中，有的說，“民主是人類的普世價值，但實現這種價值的道路卻不是惟一的”；也有的說，“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平等、博愛，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是人類社會共同追求的普世價值，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從英國、美國推行民主以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地區都實現了民主，可見其普世程度”，“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是永恆的，而民族特色是會變化的……普世價值不應該成為遷就民族特色的祭品”；還有的說，“民主政治作為普世價值已經成了世界的潮流和政治文明的標桿”，“現代民主政治往往是一種各個黨派自由競爭的政黨政治”，“民主政治是普世的價值，既然是普世的價值，這就意味著民主政治是可以移植的”，“西方民主可以移植到世界各地”，“文化差異和國情不能成為抗拒民主政治的理由”，“要民主就必須搞資本主義”等等。

還有人認為，“第三次大解放思想，就是要確立到普世價值上

來”，並把黨中央提出的“以人為本”歸結為“普世價值”；有人說：“以人為本是個綱，要貫徹這個綱，就需要民主、自由、人權等一整套普世價值，就是需要價值觀的轉變。普世價值不能確立起來，就不會是以人為本。所以價值觀問題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個基礎性問題”；還有的說，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博愛等意識形態，是“人類文明的核心，是人類在長期進化發展中形成的具有普遍世界意義的價值準則，以及由這些準則所規定的基本制度”，是“最高文明境界”，是“任何民族最終的制度進化歸宿”。

因此，無論從國內或是從國際，或是從理論界和人民群眾對西方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認識、理解和把握上看，真正弄清民主、自由和人權等，以大力宣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理論和政治制度，都是一項緊迫而重要的政治任務。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黨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政治體制改革作為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深化。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sup>8</sup> 胡錦濤同志的講話，一方面把民主作為社會主義的生命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表示了我黨支持人民當家作主的堅強決心。另一方面，強調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正確的方向，表示了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模式的認同和信心，從而否定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資本主義方向。

可以說，民主及其相關問題是一個十分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它在各種不同的理論體系包括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都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也是當前國際國內意識形態領域爭論的一個焦點。

---

<sup>8</sup>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第 28 頁。

## 二、我所認為的民主的馬克思主義定義

可以從不同角度和不同方面對民主下定義。但是，本文所探討的主要是從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識形態層面下的定義。

如本文開始所說，本文所探討的民主，是指社會政治制度層面上的民主，亦即列寧所說的作為國家形式或國家形態的一種。它不是指人民權利層面的廣義的民主權利或管理層面的民主管理原則，不是指思想觀念層面的民主精神或民主觀念，也不是指行為方式層面的民主作風和民主的工作方法等。現在理論界所爭論不休的民主，其實質都是從社會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識形態層面展開的。

馬克思說：“‘民主的’這個詞在德語裡意思是‘人民當權的’”；<sup>9</sup>“國家是抽象的東西。只有人民才是具體的東西。”<sup>10</sup> 恩格斯說：“民主這個‘概念’……每次都隨著人民的變化而變化”；“資產階級統治的徹底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國”。<sup>11</sup> 馬克思又指出：“顯而易見，如果主權存在於君主身上，那麼談論同它相對立的存在於人民身上的主權就愚蠢了。因為主權這個概念本身不可能有雙重的存在，更不可能有對立的存在”；“二者之中有一個是不真實的，雖然已是現存的不真實。”<sup>12</sup>

列寧把無產階級革命理論付諸實踐，成功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他對民主有過大量精闢的論述。他認為，“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層建築一樣（這種上層建築在階級消滅之前，在無階級社會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歸根到底是為生產服務的，並且歸根到底是由該社會中的生產關係決定的。”<sup>13</sup> “民主就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

<sup>9</sup>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2頁。

<sup>10</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頁。

<sup>11</sup>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61~662頁。

<sup>12</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頁。

<sup>13</sup> 《列寧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6頁。



即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一部分居民對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統的使用暴力的組織。”<sup>14</sup> 列寧還進一步論述說，民主“同任何國家一樣，也是有組織有系統地對人們使用暴力，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著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的平等權利。”<sup>15</sup> 但是，“只要有不同的階級存在，就不能說‘純粹民主’，而只能說階級的民主”。<sup>16</sup> “資產階級民主無論在何時何地都保證公民不分性別、宗教、種族、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它無論在什麼地方也沒有實行過”。<sup>17</sup> “極少數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制度。”<sup>18</sup> “無產階級民主（蘇維埃政權就是它的一種形式）在世界上史無前例地發展和擴大了的，正是對大多數居民即對被剝削勞動者的民主。”<sup>19</sup>

毛澤東說：“實際上，世界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鬥爭的社會裡，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權利，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sup>20</sup>

江澤民說：“世界上的民主，都是具體的、相對的，而不是抽象的、絕對的。任何一種民主的本質、內容和形式，都是由本國的社會制度所決定的，並且都是隨著本國經濟文化的發展而發展的。”<sup>21</sup>

馬克思主義上述關於這種狹義民主的含義，主要揭示的是在階級或有階級的社會裡，以國家形態所表現的民主的特殊本質。因此，民

---

<sup>14</sup> 《列寧全集》第31卷，第78頁。

<sup>15</sup> 《列寧全集》第31卷，第96頁。

<sup>16</sup> 《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0頁。

<sup>17</sup> 《列寧選集》第3卷，第700頁。

<sup>18</sup> 《列寧選集》第3卷，第189頁。

<sup>19</sup> 《列寧選集》第3卷，第605頁。

<sup>20</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60頁。

<sup>21</sup> 江澤民：《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87頁。

主的本意應該是多數人的統治，即“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這就揭示了民主與國家在本質上的一致性。它一方面是有組織有系統地對人們使用暴力，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人民）一律平等。“民主”這兩個字中，關鍵在“民”字，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人民或公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在相同歷史時期的不同歷史階段，人民具有不同的規定性。在奴隸民主制下，奴隸在法律上是物品，並不是人，只有奴隸主才是享有充分權利的公民。在封建民主制下，農民已不算地主直接佔有的物品，他可以把一部分時間放在自己的土地上為自己勞動，但他們不享受其他社會權利，只有地主才是享有充分權利的公民。在資產階級民主制下，從形式上看，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大眾都是“民”，實行的是“一人一票”的選舉制，是大多數人當家作主，但實質上是有產者少數人當家作主。資產階級民主的實質“就是容忍被壓迫者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壓迫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裡代表和鎮壓他們！”<sup>22</sup> 這就是資產階級民主制下形式與內容、名與實的嚴重背離，是資產階級民主制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也是一切私有制條件下的民主制度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

只有在真正的社會主義條件下，民主的多數人的統治才能變為現實，從而也才能實現民主的形式與內容、名與實的高度有機統一。

有人說，民主的實質是人民當家作主，這就是民主的定義。我認為，這是對民主的一般意義上的定義。這裡並沒有講清它實質性的內涵，即沒有講清其中的關鍵，即“人民”的具體內涵。我認為，可以對民主下這樣一個定義，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層建築一樣（這種上層建築在階級消滅之前，在無階級社會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歸根到底是為生產服務的，並且歸根到底是由該社會中的生產關係決定的。民主制的實質是在統治集團內部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是在整個社會上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一部分居民對另一部分居民有

---

<sup>22</sup> 《列寧選集》第 31 卷，第 84 頁。

系統的使用暴力的國家。世界上從來沒有抽象的、純粹的民主，而只有具體的、歷史的民主。不同的社會形態，有著發展著的不同社會類型和程度不同高下的民主。

廣義民主的含義，指的是各種社會形態下社會生活各個領域民主所具有的基本特徵，它適用於國家形態的民主，也適用於非國家形態的民主，還適用於國家形態下各個不同階級內部的民主。原始社會沒有國家形態的民主，但是有非國家形態下的民主的存在。恩格斯曾明確肯定原始社會有過“古代自然形成的民主制”。<sup>23</sup> 列寧也明確肯定過人類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原始的’民主制”。<sup>24</sup> 現在我們常說的黨內民主、企業民主、村民自治、社區民主、學術民主、軍事民主等都是廣義民主中國家形態下的人民內部民主精神的體現。

我們通常所說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既包括國家形態的民主，也包括非國家形態的民主，而注意力是在國家制度上。

民主是國家形式和國家形態的一種，其實質就是階級的統治，是社會上層建築中最核心的部分。而所謂的自由、人權都是在一定國家形式形態下公民權利的特定表現。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在民主、自由、人權的關係中，民主是前提、是核心。只有有了民主，才可能有自由和人權。這就如同民主是棵大樹的樹幹，自由與人權是這棵樹幹上的枝杈，枝杈是附依於樹幹的，自由與人權是附依於民主的。只有有了一定的國家形式或形態，其階級或個人的自由和人權才有可靠的保障。所以，只要講清楚了一定的民主，自由、人權等也就順理成章也就比較容易講清楚。

民主、自由、和人權，都是在人類歷史發展一定階段形成的概念。無論是在階級社會，還是在從階級向無階級社會過渡的相當長的一個歷史階段裡，或是在世界上依然存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情況下，根本就不可能有什麼全人類共同享有的民主、自由、平等與人權。資

---

<sup>23</sup>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3頁。

<sup>24</sup> 《列寧選集》第3卷，第148頁。

產階級是打著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權的旗號上臺的，它們的政府從來都把自己標榜為全體公民的代表。但是，實踐早已揭穿了資產階級的這類謊言。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平等與人權，就決不會有無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平等與人權。當然，馬克思主義決不排斥抽象思維中的認識論意義上的民主、自由、人權的一般。但是，必須準確把握和揭示民主、自由、人權的內涵與實質，以利廣大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爭取自己的民主、自由與人權。爭得這些權利，本來就是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重要目標。

### 三、關於普世價值與普世民主

綜上所述，民主如同自由與人權一樣，都是在人類歷史發展一定階段形成的概念。在不同社會形態裡，不僅民主發展程度的高下不同，而且民主的性質也有著根本的不同，從來不可能有什麼全人類所共同享有的、抽象的、純粹的或曰“普世的”民主，在階級社會或從階級社會向無階級社會過渡的歷史階段尤其如是。要講清有無普世的民主，首先需要釐清有無普世的價值。

關於普世。能否達成如下共識：一是這裡指的是人類社會和人的世界。動物不能躋身我們這裡所說“人的世界”。二是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也就是說，從橫向上說，在天地四方的空間裡，從縱向上說，在古往今來的時間裡，不分種族、民族、國家、階級及階層、文化、宗教等異同，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應該被普世價值中的“普世”所覆蓋。

關於價值。政治經濟學對價值的定義是凝結在商品中無差別的人類勞動。馬克思曾說：“‘價值’這個普遍的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係中產生的”，是“這些物能使人們‘滿足需要’的這一屬性”。<sup>25</sup> 馬克思在這裡所談到的價值，顯然是商品“使

<sup>25</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5~406頁。

用價值”概念的 direct 延伸。因此，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價值是指客體對於人或人類這一主體所具有的意義和作用。

那麼，從上述意義上講，一些人所說的所謂普世價值，就應該是指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歷史上和現實中所有的人都普遍需要和適用的東西。

根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相關論述，筆者認為，價值觀這一範疇不是抽象的，而是具有特定的社會屬性。一切既往的價值觀、道德觀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在階級或有階級的社會裡，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係中，汲取並形成自己的價值觀和道德觀。

馬克思、恩格斯說：“對資產者來說，只有一種關係——剝削關係——才具有獨立自主的意義”，“這種利益的物質關係表現就是金錢，它代表一切事物，人們和社會關係的價值。”<sup>26</sup> 恩格斯還說，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金錢確定人的價值”。<sup>27</sup> 因此，我們不僅應避免把政治經濟學對價值的定義簡單地引入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更應該避免把資產階級的金錢即價值、有用即真理的極端自私自利和庸俗實用的價值觀作為我們共產黨人的價值觀。真正的共產黨人的價值，應該是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國家利益與全人類利益、最低綱領與最高綱領的有機統一。我們的最低綱領，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們的最高綱領是實現共產主義，是實現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我們共產黨人沒有自己所追求的特殊利益，在現階段，我們的利益是與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即根本價值相一致的；從最高目標看，我們的根本利益即根本價值就是要與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和傳統的所有制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實現每一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因此，在當今時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

<sup>26</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80頁。

<sup>27</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65頁。

和最廣大人民群眾是不可能有一統一的普世的價值觀念的。

有人說，有；比如吃喝、食物與水、空氣等對所有人都具有普世價值。馬克思說：“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人的機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這些機能脫離人的其他活動領域並成為最後的和惟一的終極目的，那它們就是動物的機能。”<sup>28</sup> 恩格斯也說“人來源於動物界這一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性”。<sup>29</sup> 應該說，認為吃喝、食物與水、空氣等對所有人都具有普世價值，這是犯了基本的常識性錯誤。因為“吃、喝、生殖”等只是人和動物共通的生理機理，是全人類一切人與一切動物一樣所具有的生物性，這並不是人類一切人所特有的普遍屬性，也不是人世間所特有的“普世價值”。如果承認了吃、喝、生殖等等對所有人都具有“普世價值”，就是讓動物躋身於人類，或者是說讓人類降低到動物的水準。

有人說，如果人類沒有一個普世的價值，那不同民族、不同階級的人為何能產生一見鍾情的“純真愛情”？這裡需要弄清四點：一是不同民族、特別是不同階級的人產生的一見鍾情的“純真愛情”，往往是活躍在文學作品之中。我們知道，文學作品應當尤其是那些反映社會生活本質的經典名著也都是來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的，這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這就是為什麼即使我們讀的不是與我們同一時代或同一種文化的作品時，卻依然能夠從中發現自己生活的影子，這也是這一作品能夠打動我們的根本原因。但有的文學作品卻是誤解甚至歪曲了社會生活的本質，是作者脫離現實社會生活的情感抽象或寄託，而涉世不深的少男少女也往往從這類文學作品中尋找或寄託著自己的夢想。二是這種脫離現實社會生活的情感抽象，在社會生活中有時可能會變成一瞬間的現實。但是，在階級或有階級的社會裡，這男女雙方所謂一見鍾情的“純真愛情”，一旦置身現實社會，就往往要受到自

<sup>28</sup>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頁。

<sup>29</sup>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42頁。

身所處的一定的社會經濟文化條件的根本性制約，便往往與社會現實生活發生種種碰撞而發生衰變、裂變甚至異化，一見鍾情時所立下的“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的山誓海盟便往往不能兌現，很難愛它個地老天荒。三是不排除個別有掙脫上述制約，把這種“純真愛情”進行到底的現象，但套用馬克思所說，如果對不同民族特別是不同階級之間所謂的“純真愛情”加以抽象，使性愛等這些機能脫離人的其他活動領域並成為最後的和惟一的終極目的的，那往往仍然是動物的機能。有人往往把這種動物的機能誤認成“純真愛情”。四是愛情與性愛儘管有聯繫，但決不能劃等號。愛情是只有人類才具有的高尚情感，很難設想動物也具備這種情感。我們也決不否認人世間有上述衝破社會經濟文化等根本性制約的樊籬而要獲得自己希冀愛情的“愛情至上主義”現象，但這種現象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畢竟是極少數，也根本不具備普世的意義。

有人說，人類中傑出人物所創造的一些非意識形態的如自然科學、語言文字、形式邏輯、山水畫、無標題音樂等反映人類社會生活與精神現象的東西，也可以為全人類一切人共同學習或欣賞等等。人類社會是以能製造生產工具從事生產勞動相區別於動物社會的。從能製造生產工具從事生產勞動這一點上說，這是人區別於動物的“一切人共有的東西”的“現實普遍性”。<sup>30</sup> 人都能製造生產工具，並能共同欣賞如自然科學、語言文字、形式邏輯、山水畫、無標題音樂等一些反映人類社會生活與精神現象的非意識形態的東西，這在形式上看，似乎有了一定意義上的普世性。但是，“一切人共有的”“現實普遍性”決不能脫離人的社會性即一定社會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而單獨存在。隨著階級社會的誕生，隨著人的社會性的增強，“一切人共有的”“現實普遍性”便會被稀釋，有時甚至蕩然無存。比如，隨著剝削的產生，少部分人由於逐漸脫離了生產勞動領域，進入了專

---

<sup>30</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2頁。

事壓迫剝削他人的食利者階層行列，這樣便使其區別於動物的從事生產勞動的能力逐漸蛻化。比如，在現實生活中，無論從作者創作和受眾的角度講，也確實存在不少毫無任何意識形態色彩的山水畫、無標題音樂等文藝作品，這也可以被稱之為“一切人共有的”“現實普遍性”。但也要看到，也有不少從形式和表面上看確實存在的毫無任何意識形態色彩的一些山水畫、無標題音樂等文藝作品，但作者在創作時，有時卻是帶著強烈的感情色彩甚至是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的。不同的受眾，會從相同的作品中，讀出不同的情感甚至意識形態的色彩來，這就叫“一百個讀者有一百個哈姆雷特”。無論從作者還是受眾角度講，這都可以叫做“託物言志”。比如，由於對所有制的關係不同和分得的多寡不同，人們所接受教育的程度便有所不同，同為一部小說或喜或悲這些共通或相似的情感和認知，是要建立在不是文盲或有閑讀書這一共同的基礎之上的。另外，維也納金色大廳新年音樂會上的無標題音樂並不是所有願意聆聽的人都能購得起昂貴的門票的。“喜怒哀樂，人之情也”，從形式上，這也是一切人的“普遍性”或叫“普世性”。但是，魯迅說得好：“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哪會知道北京撿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饑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sup>31</sup> 魯迅雖然講得是舊中國，但對試圖把資產階級統治者的價值觀作為普世價值的人，是不是一個有力的回答呢？這能不能說，名稱上同曰為喜怒哀樂，窮國與富國、窮人與富人的往往有著實質內容的不同，有時甚至有完全截然相反的內涵呢？

有人說，人類除了各自的個性和特定群體的共性外，還存在著超越於一切差別的共同性，就是通常說的“人性”，例如珍惜生命、同情他人、尊老愛幼、“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正是這些共同的本性，產生了對社會生活的共同追求：民主、自由、

---

<sup>31</sup> 《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第164頁。



平等、博愛等這些普世價值。我們說，有時在討論一些抽象的理論時，往往費下很多口舌無法理論清楚，但此時一回到現實，問題往往便不難解決。說是珍惜生命、同情他人、尊老愛幼、“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人類的普世價值云云，我們看兩個事例。一是一個個體：2008年5月我國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的“范跑跑”只是珍惜自己以及女兒的生命，連其老人和妻子的生命也全然不顧，談何尊老，談何同情他人。二是一個國家：從2003年伊拉克戰爭開始到2008年7月8日，美國為征服伊拉克，美軍死亡為4114人，這還不包括死亡數萬人的僱傭軍；截止2007年底，戰爭還造成近70萬伊拉克平民死亡。請問，美國當局和而不同了嗎？飛機槍炮勿施於人了嗎？同情珍惜本國士兵與伊拉克人民的生命了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美國當局並不希望自己的國土遭受炮火連天，可是，冷戰結束之後，美國卻放開手腳，在海外其他國家連續發動海灣、南聯盟、阿富汗、伊拉克四場規模較大的戰爭。可以說，珍惜生命、同情他人、尊老愛幼、“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或僅僅是部分國家或人們的優秀文化傳統，或僅僅是一些人的良好願望，或僅僅是少數人企圖使他人甘受奴役的麻醉劑而已。但決不是全人類各個國家各個階級各個人所共同承認並遵循的所謂“普世價值”。

有人說，解決環境污染、反對恐怖主義、販毒吸毒等全球性問題可以被稱之為“普世價值”或“全人類所共有的價值”。說到底，人們或國家的價值觀念，是由人們或國家的經濟利益所決定的。治理大氣污染，無疑涉及全人類和各個國家乃至每個個人的共同利益。1985年人類開始認識到二氧化碳的增溫作用。但由於各個國家的經濟利益並由此帶來佔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念的不同，但在採取實際行動時，這一“普世價值”往往被虛化和虛幻。美國以佔全球5%的人口消費著全球25%的能源，在過去的20年，美國的人均碳排放量是中國的九倍。中國每年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僅為兩噸，而美國每年人均卻多達九噸。但美國卻“果斷”地拒絕加入全球任何就減排達成一致的國

際協定，也不簽署將於 2012 年到期的《京都議定書》。至於“反恐主義”，現在各個國家及各個階級對其定義都極不統一甚至截然相反。有的實質上為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義國家卻借著反恐為名，公然到處踐踏聯合國憲章和公認的國際關係法準則，肆意侵犯他國主權甚至赤裸裸入侵他國。至於販毒吸毒，之所以成為全人類肌體上很難癒合的頑疾，同樣是由於特定國家的社會制度及特定集團、人群的特殊利益所決定的。至於絕大多數國家和絕大多數人在經濟社會生活中成形的共有利益和共有價值觀念，這無疑在現實社會生活與觀念形態中存在。但這與有的人所說的普世價值也有著根本的不同。在存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裡，在階級和有階級的社會裡，為一切國家和一切階級、一切人所共同接受的普世價值是從根本上就不存在的。

有人說，奧運會倡導的“更高、更快、更強”的奧林匹克精神和北京奧運會確立的“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主題超越了國家政治的局限，具有普世價值。實際上，奧運會的上空總瀰漫著濃厚的政治對立空氣。且不說 1916 年的柏林奧運會、1940 年的東京奧運會和 1944 年的倫敦奧運會因為兩次世界大戰被取消，1936 年的柏林、1956 年墨爾本、1968 年墨西哥、1972 年慕尼黑等奧運會都沒有擺脫被政治化的命運。1980 年莫斯科奧運會的政治化達到頂峰，美國帶頭對這屆奧運會進行抵制，而四年後洛杉磯奧運會時，蘇聯則率領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進行抵制，奧運會成為冷戰的延伸戰場。北京奧運會聖火在境外傳遞屢遭干擾。奧運會前夕西方大媒體上鋪天蓋地的是對中國所謂“西藏問題”、“人權問題”喋喋不休的指責。北京奧運會舉辦前，各國報名到北京參加報道記者達萬人之多，其中有相當數量是因為預測北京奧運會舉辦期間將會發生各種重要事件的西方記者；當預測北京奧運會可能會舉辦得十分成功時，來到北京參加奧運會的記者卻只有三、四千人。由此可見，一些西方記者對報道奧運會運動場內任何一條打破世界紀錄的精彩賽事和“更高、更快、更強”的奧

林匹克精神並未有多大興趣。2008年8月8日，北京奧運會開幕的日子，也應當是世界休戰日，格魯吉亞正是選擇在這一天對南奧塞梯發動進攻。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上布什與普京“談笑風生”，而卻在數千公里之外暗暗進行著政治軍事的角力。“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口號，集中體現了奧林匹克精神，充分反映了中國和世界各國廣大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強烈願望，但卻未成為當今國際世界的普世價值。

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說，在階級社會和階級社會向無階級社會過渡的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內，具體的人、集團和階級總是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生存的社會條件上產生不同情感、價值觀念、思想方式和世界觀的。其經濟、政治、文學、哲學和道德等社會意識形式的內容主體和本質屬性，都反映著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利益結構和社會關係，都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時代性和社會形態的質的規定性，根本不存在所謂的“普世價值”。普世價值的爭論實質上是普世價值觀的爭論。如果有人一定要講“普世價值”，其實質是要想把他們的特定價值定為普世價值。有人引用胡錦濤同志指出的“中國共產黨85年的歷史，就是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繁榮，為中國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奮鬥的歷史”的講話，企圖證明自由、民主、幸福是全人類的普世價值，這是沒有道理的。胡錦濤同志在講話中明確作出了“中國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的質的規定性。這對有的人論證全人類的普世價值的存在不僅毫無裨益，而恰恰說明了“自由、民主、幸福”的階級和國家的本質屬性，是對“自由、民主、幸福”所謂普世性的否定。

在階級社會和階級社會向無階級社會過渡的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內，探討清楚了並不存在所謂的普世價值，那麼，作為從形式到內容完全具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國家形式或形態的民主也就更加失去了所謂的普世性。

關於民主的普世性，現在媒體上討論得極為熱烈。其中一種觀點

認為，各種不同民主政治的歷史背景、階級屬性、實現形式有著很大甚至根本的不同，但是，它們之間總是存在著一些具有共性的東西，也就是所謂民主的一般特徵，亦即民主的普世性或普適性。這些特徵包括：1、主權在民，即人民當家作主；2、在自由與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協商；3、按照多數人的意志進行決定；4、程序化；5、保護少數。當然，民主還有其他各種原則，譬如代議制原則、權力制約的原則、選舉的原則等。而上述幾個原則，則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則，是民主普世性或普適性的集中體現。

我認為，上述說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值得商榷。

其一，任何事物都是形式與內容的有機統一。形式是我們區別客觀世界各種現象的外部標誌之一，是事物運動的外在方式。而內容，就是事物矛盾運動的本身，是構成這一事物的一切要素的總和。事物的性質，本質上是由其內容所規定的。相同的事物，可能有不同的外在表現形式；不同的事物，也可能有相同的外在表現方式。在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的歷史中，各種不同民主政治的歷史背景、階級屬性、實現形式有著很大甚至根本的不同，但是，不同民主的外在表現形式上也存在著一些相同的東西。我們也可以把這稱之為各種不同民主的外在形式的一般特徵，但還不能稱之為民主的普世性或普適性。因為，任何形式與內容都緊密聯繫在一起並須臾不可分離。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內容決定形式，內容決定事物的性質。離開民主的根本性質，僅憑性質根本不同的民主在形式上的某些相似之處，就把某種特定時代、特定階級、特定國家的民主視為全世界普遍適用的民主制度，是很不妥當的。

我們可以按照馬克思主義對“個別和一般”的思想方法來看一下“普世民主”。當我們把各種不同形式和形態的民主概括在民主這一概念下的時候，我們是把它們的質的差異撇開了。因此，民主這一概念本身與各種不同形式與形態的、特定的、實存的民主不同，它在社會歷史的實際生活中並不是感性的存在。民主一般僅僅是民主的一切時

代有某些共同標誌、共同規定性的一個合理的抽象。經過比較而抽出來的民主一般的共同點，本身就是有許多組成部分的、分為不同規定的東西。其中有些屬於一切時代，另一些是幾個時代共有的。有些規定是最新時代和最古時代共有的。沒有它們，任何民主都無從設想；但是如果說最發達的民主和最不發達的民主具有一些規律和規定，那麼，構成民主發展的恰恰是有別於這個一般和共同點的差別。對民主一般適用的種種規定所以要抽出來，也正是為了不致因為有了統一而忘記本質的差別。那種證明現存的某種民主制度具有“普世性”並將永存的人、集團或國家，就在於忘記了這種本質的差別。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切時代民主所共有的、被思維當作一般規定而確定下來的規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謂一切民主的一般條件，不過是這些抽象要素，用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個現實的歷史的民主。因此，一說到民主，應該總是指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歷史的、具體的民主。

比如說，所謂“普世性民主”中的“主權在民”的第一個原則，是在公元前六世紀初開始的雅典民主制中逐漸確立的。創立這一民主制的伯里克利明確宣稱：“我們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是因為政權是在全國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sup>32</sup>毫無疑問，古希臘民主是人類古代民主的燈塔，但它的民主制的輝煌成就是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上的。據相關統計，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發生時，雅典成年公民為四萬人，其家屬 14 萬，異邦人七萬，奴隸在 15~40 萬之間。其家屬、異邦人和奴隸是不享受公民權的，真正享有公民權的僅有十幾分之一。<sup>33</sup>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曾明確指出：“民主……是一種迷人的政府形式，變化多端、雜亂無章，給同等者和不同等者都分配以某種形式的平等”。<sup>34</sup>此後的法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

---

<sup>32</sup> 修昔底德著，謝德鳳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商務印書館 1960 年，第 130 頁。

<sup>33</sup> 應克復等著：《西方民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8 頁。

<sup>34</sup> 丹尼爾·B·貝克：《權力語錄》，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第 21 頁。

家盧梭又提出了“人民主權”理論，但他又說：“從民主這個詞的嚴格意義上說，真正的民主從未存在過，而且永遠也不會存在。”<sup>35</sup>

現在，多數人也都認為民主是多數人的統治。我們從民主的構詞上也可以看出，民主的本質是人民自己作主，它的對立面不僅僅是君主，而且還有資本主義民主即資本主導下的民主。這就是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主權在民即人民當家作主原則，體現和實現的實際上是資產者作主的原則；在自由與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協商、按照多數人的意志進行決定等原則，主要是在資產者內部實現的。在這裡，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這個“絕大多數”實際上沒有任何地位。至於整個社會中有時候真正多數人享有的民主權利，並不是天賦的，也不是別人恩賜的，而是靠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者自己的鬥爭爭得的，比如，八小時工作制、“三八”婦女節、“五一”勞動節等。也可能會有同志說，他們有“選舉中的神聖一票”。其實，這神聖的一票僅是表面和形式上的。筆者在後面將專門涉及這個問題。

資本主義雖然有口號上與形式上的平等，但要看到，資本主義既有一人一票這樣的形式上的平等，又有經濟上的實際不平等和隨之而來的社會的不平等。列寧把這稱之為“資本主義的基本特點之一”，並說“這是資產階級的擁護者自由派用謊言掩蓋的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卻不瞭解的一個特點。”<sup>36</sup> 口頭上主張競爭自由、貿易自由、金融自由和信仰自由、宗教自由的人與國家，是否就不獨裁和專制了呢？我們作判斷，決不能依據他們口頭上說什麼，而更要看他們做什麼。正因如此，列寧明確指出：“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中，被壓迫群眾隨時隨地都可以碰到這個驚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資本家‘民主’所標榜的形式上的平等，一方面是使無產階級成為僱傭奴隸的千百種事實上的限制和詭計。”<sup>37</sup> 他們形式上有“選舉中的神聖一

<sup>35</sup> 丹尼爾·B·貝克：《權力語錄》，第23頁。

<sup>36</sup> 《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3頁。

<sup>37</sup> 《列寧選集》第3卷，第605頁。

票”，但選舉之後，便千方百計排斥他們，千方百計地把他們排除在管理國家之外。資產階級議會對勞動人民群眾來說，是資產者壓迫無產者的工具。這是資產階級民主的實質內容。列寧在批判謝德曼派和考茨基派總是談論“一般‘民主’”時，曾尖銳地指出：“剝削者營壘總是把資產階級民主冒充為一般‘民主’而一切庸人，一切小資產者，直到……社會民主黨的大部分領袖，都跟著這個營壘隨聲附和”；<sup>38</sup>“他們一談到‘多數’時，總以為選票的平等是被剝削者同剝削者平等，工人同資本家平等，窮人同富人平等，飢餓者同飯食者平等”；“善良、誠實、高尚、和氣的資本家，從來就沒有利用過財富的力量、金錢的力量、資本的權力、官僚政治和軍事獨裁的壓迫，而真正是‘按多數’來決定事情的！”列寧還說，他們如此對資產階級民主進行粉飾，“一半是由於虛偽，一半是由於幾十年從事改良主義活動所養成的極端愚蠢。”<sup>39</sup>列寧當年對考茨基等“一般‘民主’”、“純粹民主”的批判，對於我們今天討論“普世民主”難道沒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嗎？

其二，和任何其他事物一樣，民主也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或者說共性和個性。和任何其他事物一樣，民主也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或者說共性和個性。共性寓於個性之中，並通過個性體現出來。民主的共性是從各種民主的國家管理形式或國家管理制度中抽象、概括出來的。但這種共性與個性一樣，都是同時存在於每一種具體民主的歷史形態之中的。如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既包含有某些共同的特點，但更具有根本不同屬性的個性；前者反映了民主形式的某些普遍性或共性，後者反映了民主本質的特殊性或個性。不能因為民主形式的某些普遍性而否認民主本質的特殊性，也不能因為民主的本質特殊性而否認民主形式的某些普遍性。需要強調的是，“普遍性”和“普世性”也不是一回事。“普遍性”是哲學用語，是自在的、內生

<sup>38</sup> 《列寧全集》第 37 卷，第 203 頁。

<sup>39</sup> 《列寧全集》第 37 卷，第 207 頁。

的，存在於事物內部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的客觀存在的規律性；而普世性從概念的來源看，是個宗教用語，它強調的是社會及人類的共同價值觀念。從原意上理解，是超越塵世，其真理性來自上帝賦予的啟示。因此，是一個不需要前提和證明的虛幻。但它會被現實中的一些人、集團、國家所利用，它不僅是虛幻的主觀意願，而且更是想把這一願望變成所謂“普渡衆生”的現實。因此，是否可以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極力鼓吹的所謂“民主的普世性”，實際上是新帝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和西化、分化、規制化中國並最終把我們殖民化的政治主張和理論武器？

因此，我們決不能把需要借鑒和汲取的各種具體民主的形式中的某些普遍性，誤認成需要把這種民主從形式到內容都要全部、整體地照抄照搬過來。資產階級的民主，在形式上汲取了奴隸制民主和封建制民主的精華，並在其民主的形式上進行變革創新，以適應資產階級自身的需要。對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的形式中包含的所有精華，我們應大膽吸收和借鑒。在這上面，我們決不能重犯“左”的錯誤。由於其歷史的局限性和階級的狹隘性，資產階級民主根本不具有“普世價值”。我們不能簡單地否認各種不同具體民主形式上的普遍性，更不能承認西方民主從形式到內容的“普世價值”，否則，我們在民主問題上，就會出現偏差而陷入被動，甚至如馬克思所說，“就會倒臺”！

列寧在批判考茨基的所謂“純粹民主”時還說：“考茨基迷戀於民主的‘純粹性’，無意中犯了一切資產階級民主派常犯的那個小小的錯誤：把形式上的平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徹頭徹尾虛偽騙人的）當作事實上的平等！”<sup>40</sup>

鄧小平曾說：“我們在宣傳民主的時候，一定要把社會主義民主同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民主嚴格區分開來，一定要把對人民的民主和對敵人的專政結合起來，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紀

---

<sup>40</sup> 《列寧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3頁。



律、民主和黨的領導結合起來。”<sup>41</sup>

鄧小平還說：“關於民主，我們大陸講社會主義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的概念不同。……我們一定要切合實際，要根據自己的特點來決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sup>42</sup> 因為，“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消滅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它使人口密集起來，使生產資料集中起來，使財產聚集在少數人的手裡。由此必然產生的結果就是政治的集中。”<sup>43</sup> 財產集中必然帶來政治集中，政治集中必然帶來意識形態的集中。這就是從經濟基礎集中到上層建築集中的必然路徑。本來，民主是要彰顯各類個性，結果卻來了個“普世民主”的“統一”。一些國家為了推行“普世民主”，甚至不惜動用戰爭手段。民主雖然是一個頗為動聽的詞彙，但在西方民主的辭典裡，民主就是反共。從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講，“普世民主”就是專制或專政，是與民主的本義完全相悖的。

人民民主或社會主義民主是與資產階級民主相比較而存在的。不講清楚資產階級民主，就無法講清楚人民民主或社會主義民主。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著多數人的民主或統治，都倡導多數人的平等。但在現實的經濟政治社會生活中，資產階級民主卻是少數人享有的民主，大多數人處於被剝削被壓迫者的地位。而社會主義民主從內容到形式都是人民當家作主，都是多數人之間的平等。我們講，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在這裡所說的民主，已經不是所謂抽象的、純粹的民主了，而是有著其具體的規定性，是對社會主義民主的省略或約定俗成。這裡的本意與實質所指的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人民民主或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如果不省略，這句話的全部表述是：沒有人民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美國等發達西方國家的民主，主要是壟斷資產階級的民主，是壟斷資本主導下的民主，與

<sup>41</sup>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6頁。

<sup>42</sup>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1頁。

<sup>43</sup>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7頁。

我們的人民民主或社會主義民主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

對工人階級和勞動大眾而言，說資產階級民主虛偽，也就是說，他們在政治旗幟上寫的是“人民民主”，而在現實的經濟和政治生活中，工人階級和勞動大眾卻被排斥在民主之外，處於被剝削和被壓迫的地位。如 1960 年，戴維·布林克利在美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講話中說：“這是空間時代的首次大會——在這個時代，競選者能夠向月亮作出承諾，並能兌現承諾”。<sup>44</sup> 再如，1989 年 1 月 20 日，曾擔任過美國政府駐中國聯絡處主任的喬治·布什在就任美國總統後發表就職演說時明確表示，他在擔任總統期間要“為人民服務”。<sup>45</sup> 喬治·布什的此“為人民服務”與毛澤東的彼“為人民服務”字面上完全相同的，但其本質內涵是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這就如同資產階級的“民主”與我們的社會主義的“民主”一樣。這裡還需要指出的是，我們說資產階級民主是虛偽的，是指對於工人階級和勞動大眾的虛偽，而對於資產階級本身來說確是真實的。當然，資產階級的共和制、議會和普選制，從全世界社會發展來看，同農奴制和君主制相比，毫無疑問是一大進步。但是，在資本佔統治地位的國家，不管怎樣民主，都是資本主義國家，而且這種共和國愈“民主”，資本的統治就愈隱蔽、愈巧妙、愈厲害也就愈無恥。

如果承認了一些人所說的“普世民主”，也就等於承認了存在絕對的、超階級的民主。列寧曾經指出：“這種錯誤觀念的根源就是從資產階級那裡繼承下來的偏見”，“從無產階級看來，問題只能這樣提：是不受哪個階級壓迫的自由？是哪一個階級同哪一個階級的平等？是私有制基礎上的民主，還是廢除私有制的鬥爭基礎上的民主？如此等等”。<sup>46</sup> 任何民主，與任何政治上層建築一樣，這種上層建築在階級消滅之前，在無階級社會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在此之前，

---

<sup>44</sup> 丹尼爾·B·貝克：《權力語錄》，第 44 頁。

<sup>45</sup> 張海濤：《再說美國》，北京出版社 1991 年，第 67 頁。

<sup>46</sup> 《列寧全集》第 37 卷，第 277 頁。

講什麼所謂的普世民主，就必然是愚弄人民的謊言。正如同列寧在批判考茨基鼓吹的“純粹民主”的言論時所說：“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歷史，那就很明顯：只要有不同的階級存在，就不能說‘純粹民主’，而只能說階級的民主。”<sup>47</sup> 因此，一旦承認民主具有“普世性”或“普適性”，即是承認有考茨基所說的“純粹民主”，就是有意無意重複一些人企圖用來愚弄人民的謊言。

我認為，民主沒有抽象的“普世性”，但在其類型上分高下。奴隸民主制是對原始社會“古代自然形成的民主制”的進步，封建君主制是對奴隸民主制的進步，資本主義民主制是對封建君主制的進步，社會主義民主制又是對資本主義民主制的進步。社會主義民主制是人類歷史上新的更高類型的民主。而一些人在社會主義問題上，總是否定其共性，而高揚其個性；在民主問題上，卻總是否定其個性，而大肆張顯其共性。這實質是在理論邏輯上的雙重標準。

有人說，“民主是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國人民的普遍要求”。正因為民主沒有抽象的“普世性”，但在其類型上分高下，因此，上述這句話，是否可以改為這樣的表述：民主是人類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國家，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上共同創造和積累的政治文明的成果，追求新的更高的民主也是世界各國人民的普遍要求

#### 四、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國的民主制度沒有普世性

有人所說的“普世價值”，實質上是要講指美國的民主制度具有“普世價值”。

我們應當看到，在私有制條件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具有以下幾個明顯的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

---

<sup>47</sup> 《列寧全集》第 37 卷，第 243 頁。

一是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口號上標榜平等但是實際上不平等。比如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一開始便宣稱：“我們認為這一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sup>48</sup>這就是著名的“天賦人權”說。而實際上，當時簽署宣言的卻是清一色的白色男人紳士，他們筆下和心目中的人，並不包括黑人與婦女。1920年美國婦女才有選舉權，1965年美國黑人才真正擁有投票資格。資產階級在憲法的旗幟上講民主，而在憲法的細節裡卻是赤裸裸的專政；在憲法這個母法裡講民主，而在子法即工廠法典中，卻通過私人立法確立了對工人的專制。同樣是專制社會，只是奴隸監督者的鞭子被監工的罰金簿代替了，一切處罰都簡化成為罰款和扣工資。在資本主義國家，情況往往是這樣，即你可以遊行示威，可以罵總統，但你對你的老闆卻必須絕對地服從。無論是在傳統還是現代意義上的工廠或公司裡，老闆或總裁總是對工人或職員實行專制的“奴隸主”或“皇帝”。

在奴隸和封建專制社會，在熊彼特所說的“精英民主”的資本專制社會，它們有著共同的普遍性，這就是對少數人的民主，對多數人的專政，即是對統治集團內部少數人的民主，而對其他或是廣大奴隸或是廣大農民或是廣大無產階級的專政。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民主才是對工人階級和最廣大勞動人民的多數人的民主，是對敵視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的少數人的專政。當然，也不排除一些打著社會主義招牌實質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專政的情況出現。只要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會承認，在階級或有階級的社會裡，不是對絕大多數人的專政，就是對極少數人的專政，所謂全民國家和所有成員的民主是不存在的。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從本質上講，多黨制不過是統治集團內部民主表現形式、權力分配方式與所謂“普世民主”的點綴而已。在美國，僅僅是數萬甚至是數千富有的人或是他們的代理人在管理著美國。不

---

<sup>48</sup> 陸鏡生：《美國人權政治》，當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第126頁。

過在美國共和黨的背後主要是軍工、石油、製造等“傳統商業”的支撐，而民主黨的背後主要是金融、電信、傳媒等“新興商業”的支撐。

二是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形式外殼上平等但實際內容上不平等。比如一人一票選舉制的平等，也僅僅停留在形式上而已。現在美國的大選往往參選率僅有一半多一點，無論何種原因，這在實質上就是剝奪了近半數人的參選資格。此外，這種形式上的平等又往往掩蓋著經濟的不平等和隨之而來的社會不平等。美國目前的百萬富翁超過八百多萬，但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多達幾千萬。整日花天酒地和每天沿街乞討的人之間，能說是平等的嗎？另外，美國的聯邦法律規定實行普選制，但又通過“選舉人”制和州法律的“勝利者得全票”制即通吃制暗渡陳倉地改變和相當程度地削弱了普選制。

讓我們再打一比方，來進一步說說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就像一個偌大的發育不健全的股票市場裡的一個個股民。在股票市場裡，從形式上看，任何一個股民，都有權利決定在任何情況下出入股市的“民主權力”；而實質上，大資本卻有操控股市“坐莊”的“民主權力”，從表面和形式上看，小股民與大資本，各自有各自的“民主權力”，似乎並行不悖，十分平等；但在這表面十分平等的形式下，小股民有時會被大資本洗劫得傾家蕩產。股市中這種表面上的平等，掩蓋著大資本掌控小股民命運的實質上的不平等。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形式上看，如同股民自由進出股市一樣絕對平等，但實質上候選人只能在壟斷資本事先圈定好的兩個之間進行選擇。即使在兩人中間進行選擇，看似自由，其實也極不自由，實際上壟斷資產階級早已通過輿論操縱了人們的思想，從而也無形地掌控了人們投票的這只手。這在後面將專門論及。

三是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本質上是金錢政治。曾幫助 1896 年威廉·麥金利贏得美國總統大選的馬克·漢納說過：“要贏得選舉，需要兩

個東西。第一是金錢，第二我就記不得了。”<sup>49</sup> 美國一位作家兼評論家也說：“無論民主制度在理論上怎麼講，在實踐上人們有時傾向於把它定義為標準化的商業情節劇。”<sup>50</sup> 從 1789~1797 年擔任美國首屆總統的喬治·華盛頓，到 2004~2008 年的第 55 屆總統喬治·布什，絕大部分擔任美國總統的人出身富豪，可以說總統職位是富人的“專利”。許多人印象中的“平民總統”其實都不貧窮。華盛頓去世後，傳記作家試圖把他描繪成出身卑微的農民，但是他實際上成長於擁有 49 個奴隸、佔地一萬多英畝（約 40.5 平方公里）的莊園。《福布斯》雜誌說，華盛頓在任期間就已躋身“美國 400 富豪”之列。美國第七任總統安德魯·傑克遜被認為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平民總統”。但實際上傑克遜在南卡羅來納一處莊園長大，莊園裡擁有多名奴隸。第 16 任總統亞伯拉罕·林肯經常說自己年輕時窮困潦倒，但他出生時，他的父親托馬斯·林肯擁有兩個佔地 600 英畝（約 2.4 平方公里）的農場和幾塊城鎮地皮，還有大量的家畜和馬。林肯五歲時，他的父親已成為肯塔基地區最富有的農場主之一。

共和黨是 1854 年成立，從 1860~2004 年，美國“驢象兩黨”先後進行 39 次總統選舉。其中，絕大多數是競選開支超過對方的一方獲勝。1860 年大選，共和黨人林肯競選費用為十萬美元，而民主黨人道格拉斯為五萬美元，林肯勝出。2008 年美國總統選舉，同樣是創美國總統選舉歷史上個人籌款紀錄籌款多的 6.41 億美元的奧巴馬當選，而籌款僅三億多的麥凱恩敗北。美國總統競選的費用在近些年不斷刷新紀錄。1980 年的總統競選耗費資金僅為 1.62 億美元，到 1988 年翻了一番，達到 3.24 億美元。到了 2000 年，競選費用總額猛漲到 5.29 億美元，而 2004 年再創新高，達到 8.81 億美元，其中兩黨候選人布什和克里籌到的競選費用總額就超過了五億美元。2008 年的美國總統

---

<sup>49</sup> 費利佩·薩阿貢：〈美國的民主癌症〉，西班牙《世界報》2000 年 8 月 16 日。

<sup>50</sup> 丹尼爾·B·貝克：《權力語錄》，第 35 頁。

選舉本身更是創下 24 億美元新高。<sup>51</sup>

讓我們再來看看美國的遊說集團。建國伊始，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中的第十篇闡明的主要論點是：美國人生活在利益集團的迷宮之中；廢除衝突利益集團的鬥爭會損害自由；鑒於使全體人民擁有相同的意見、情感和興趣又絕無可能，因此形成派別或利益集團也在情理之中；問題的關鍵是要把利益集團的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sup>52</sup> 為達到此目的，美國直到 1946 年才制定了《聯邦管制院外遊說活動法》。但就是這惟一的一部相關法律，也只是對利益集團的活動予以規範，而並非是要限制。比如該法律要求遊說公司到國會秘書處登記，定期呈報活動記錄報告和收支情況等。這部法律的最大弱點或漏洞，在於未責成任何機構負責該法的實施，以及對遊說活動與議員關係的規定含混不清。這一切使得該法對利益集團活動的約束力大打折扣。<sup>53</sup>

被稱作“旋轉門”的機制，也是我們瞭解美國腐敗的最便捷的切入點。所謂“旋轉門”，指的是個人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雙向轉換角色、穿梭交叉為利益集團牟利的機制。大體而言，“旋轉門”機制可以被歸為兩類。第一類是由產業或民間部門進入政府的“旋轉門”，這主要是指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和商業利益集團遊說者進入聯邦政府並擔任要職。在政策制訂和實施的過程中，這就可能為他們曾經代表的團體謀取特別的好處。第二類是由政府進入私人部門的“旋轉門”。以前的政府官員充當遊說者後，也可以利用自己與政府的聯繫來為現在所代表的團體謀取特別的利益。在當今的美國，“旋轉門”司空見慣，而且運轉良好，並且已經成為當代美國腐敗的加速器。這

---

<sup>51</sup> 〈美國大選共花費 53 億創新高〉，《今日美國報》網站 2008 年 10 月 24 日，參見 <http://www.big5.hinews.cn/news/system/2008/10/25/010341513.shtml>。

<sup>52</sup> 漢密爾頓、傑伊、麥迪遜：《聯邦黨人文集（一）》，九州出版社 2007 年，第 117~133 頁。

<sup>53</sup> 李道揆：《美國政府和美國政治》，商務印書館 2004 年，第 310~312 頁。

種深深植根於美國政治文化傳統的、以遊說來達到一己之私的現象或存在，便是被稱作除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美國“第四權力中心”。它不僅開創了一種腐敗文化，而且為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的腐敗行徑披上了合法外衣。金錢是進入上述兩種“旋轉門”的入場券。很多團體在遊說上每年都要花費上百萬美元甚至更多。

四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是金錢操縱輿論、輿論操縱民主的“民主”。為了進一步說明這一點，筆者在這裡引用愛因斯坦早在 1949 年《為什麼要社會主義？》一文中所說的較長的一段話：

私人資本趨向於集中到少數人的手裡……這些發展的結果造成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它的鉅大權力甚至連民主組織起來的國家也無法有效地加以控制。事實的確如此，因為立法機構的成員是由政黨選出來的，而這些政黨要不是大部分經費是由私人資本家提供的，也是在其他方面受他們影響的，他們實際上就把立法機構和選民隔離開來了。結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實上不充分保護人民中無特權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此外，在目前的條件下，私人資本家還必然直接或間接地控制情報和知識的主要來源（報紙、廣播電臺、教育）。因此，一個公民要達到客觀的結論，並且理智地運用他的政治權利，那是極其困難的，在大多數場合下實在也完全不可能。<sup>54</sup>

愛因斯坦決不僅僅是一個偉大的物理學家，他上述這段話，把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的權力和所謂民主的關係講得清清楚楚。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美國著名戲劇家帕迪·查耶夫斯基講：“電視是最醜惡的民主。”<sup>55</sup>

事實的確如此。2008 年 5 月，筆者到布魯塞爾的歐盟總部訪問，在與其幾個議員和研究機構交談時進一步認識到，在現代西方社會，壟斷資本往往是通過金錢和所謂的公關公司、遊說集團等控制立法、

<sup>54</sup> 愛因斯坦：《愛因斯坦文集》第 3 卷，商務印書館 1979 年，第 272 頁。

<sup>55</sup> 丹尼爾·B·貝克：《權力語錄》，第 44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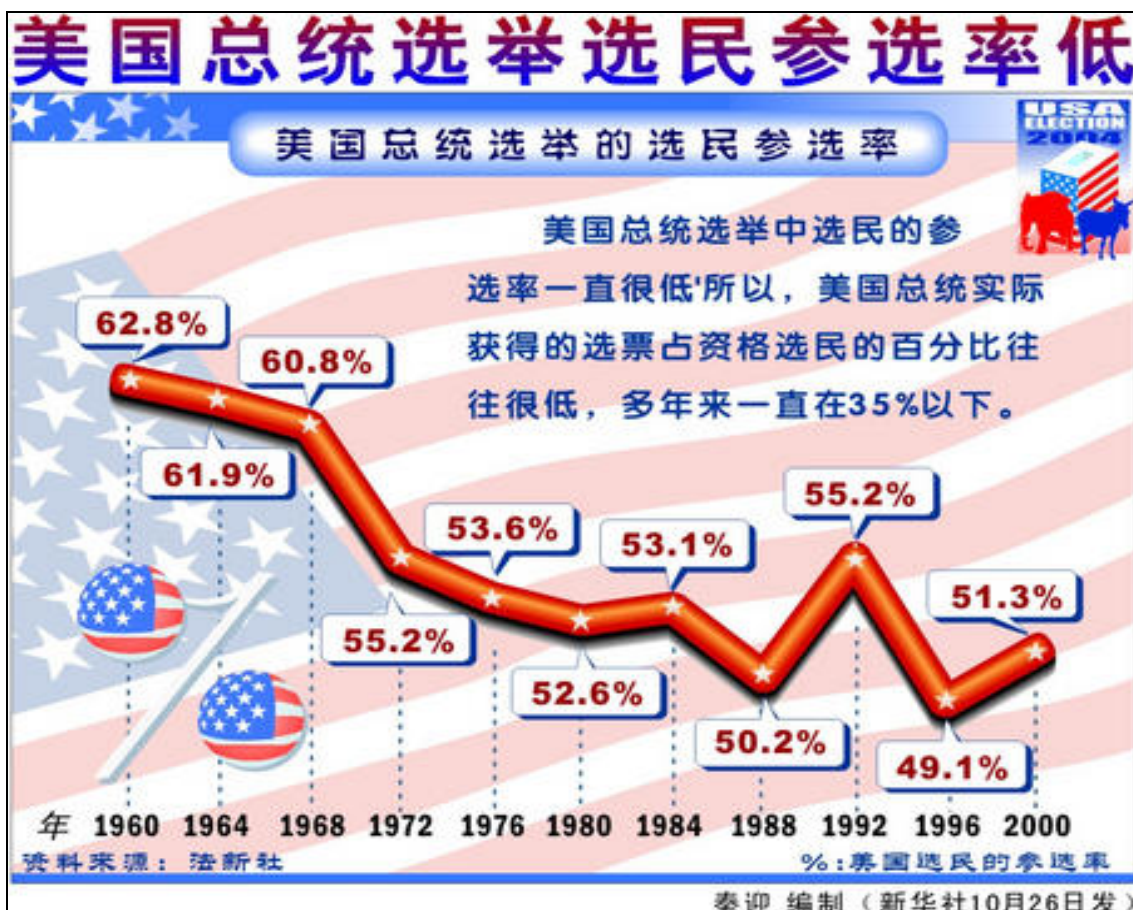


行政、司法機構，通過控制各種新聞媒介控制社會輿論和民衆意識。在近幾次的美國大選中，有些主要電視臺播出的競選廣告，平均每分鐘竟達上億美元。從表面上看，選舉時，民衆都有所謂的人人平等的一票，但實質上，事先已經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即被灌輸的意識在操縱著民衆，去投壟斷資本事先已經選定好的代理人。民衆的所謂權力與自由，只不過是在他們事先設定好的資本統治集團內部少數不同代理人甚至僅在其兩人之間進行選擇罷了。這種極其有限的在幾個人之間選擇自己權力代理人的民主，在選舉完結之後，便把民主又還給了辭典。

美國一是以從海外攫取的大量合法非法超額利潤即金錢，在其國內建立所謂“福利社會”的“示範效應”，以從根本上增強美國所謂民主制度的吸引力、向心力和凝聚力。二是投入大量金錢興辦各類媒體，在其國內特別是世界上大肆宣揚其“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念，拚命詆毀他們企圖顛覆的國家的執政者，用名目繁多的罪名指責發展中國家“獨裁”、“專制”、“暴政”、“侵犯人權”、“自閉”等，使廣大發展中國家和人民喪盡自尊，無顏自立；然後，使其所謂的“民主”、“自由”、“人權”、“新自由主義”等價值觀念和政治法律制度及政策在發展中國家暢通無阻，從而既達到了西方國家和國際壟斷資本對發展中國家殘酷剝削壓迫的目的，同時又能用這些巧妙動聽的語言掩飾它們殘酷剝削壓迫的實質。當金錢所壟斷的媒體在世界鋪天蓋地都是一種聲音和價值觀念的時候，普通群衆是很難區分對錯的。三是撥出專款在對象國收買、培植代理人和所謂的“民主自由鬥士”，籌建、資助、利用各種非政府組織，使它們成為推行所謂“民主自由”的先鋒。四是利用對外援助，誘使對象國自覺自願地進行所謂的“民主改造”並同西方民主制“接軌”。這種援助，在它們的“民主價值觀大潮”興盛之際，往往會減少投入；而在“民主價值觀”受到置疑之時，往往會加大投入。冷戰結束後的 1995~2000 年期間，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 發展援助委員會 (OECD / DAC)

成員國淨官方發展援助（ODA）總值逐年下降，從 587.8 億美元下降到了 537.49 億美元。隨著美國等西方國家“硬實力”的碰壁，他們又開始重視發揮“金錢外交”的“軟實力”的作用。後冷戰時期的“援助疲勞症”至此不治而愈。自 2002 年起，世界主要援助國普遍增加了對外援助撥款，年均增幅在一百億美元以上，其中美國在 2001 年以後對外援助的增幅，超過了“馬歇爾計劃”以後的任何歷史時期。

五是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政治。我們還應注意，競選費用正在扶遙直上，但是民衆參選率卻是江河日下：



2004 年選舉受到選民的高度關注，據統計，60%的選民（1.2 億人）參加了投票。布什獲得 51%的選票連任，實質是只佔全體選民 30%多一點。這 30%多一點的贊成票中，實質也有不少是對方的反對票。2008 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民衆的參選率可能比較高，原因主要是美

國民衆對美國金融危機出路的關切，其次是由於黑人奧巴馬的參選。黑人奧巴馬的當選，無疑也是美國資本主義民主的一次進步。

六是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往往對內“仁慈”而對外野蠻；有時對內爲了達到自己的目的，甚至連表面和形式上的所謂民主與平等都要拋棄，而顯現出“獨裁”和“霸道”的“本色”。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未來的結果〉中說：“當我們把自己的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體面的樣子，而在殖民地它就絲毫不加掩飾了。”<sup>56</sup> 西方資本主義強國以從海內外攫取的大量合法非法的超額利潤，除了被少數壟斷集團攫取外，拿出少量在國內建立所謂的“福利社會”，這一方面是其國內長期穩定、長期統治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為在全世界“示範”西方強國的政治、經濟制度的優越，以向全球更加有效地輸出自己的民主政治。實際上，美國等西方強國的民主制，與希臘、羅馬的民主制是一樣的，是建立在對外征戰和奴隸的基礎之上的，它們對內表現得分外“仁慈”，而對外卻特別殘酷。因此，美國經濟增長的真正奧妙並不在於高科技，而是通過金融、高科技、軍事和文化等手段，企圖在全球範圍內對所有勞動領域的勞動者的絕對控制。近 40 年來，美國的香蕉公司、銀行和石油公司通過種種管道每年對哥倫比亞進行幾千萬甚至多達數十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從而在哥倫比亞政府軍的保護下掠奪其廉價資源，剝削該國的勞動力。

就是在對內“仁慈”的表面下，美國政府對人民來說，實質上沒有民主，而本質上是赤裸裸的專政。近幾年，美國國務院常常是每年度都要發表對別國的人權報告，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 19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權狀況進行指責，卻對自身的人權問題隻字不提。為了讓世界人民瞭解美國真實的人權狀況，回應美國國務院對中國人權狀況

---

<sup>56</sup> 〈不列顛在印度統治未來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第 772 頁。

的肆意歪曲和無理指責，敦促美國反思其所作所為，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連續第九年發表美國的人權紀錄。2008年3月13日發表《2007年美國的人權紀錄》中指出，美國暴力犯罪上昇，嚴重危及人民的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2006年，美國全國暴力犯罪為141萬起，比2005年增加了1.9%。美國擁有私人槍支達2.5億支，美國每年約有三萬人死於槍擊。美國執法、司法部門濫用職權，嚴重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權利。美國監獄的虐囚現象很普遍。2006年，美國監獄共關押了超過226萬犯人，人口僅佔全世界人口的5%，而囚犯佔全球囚犯總數的25%。美國公民享有的個人自由和權利正在逐步縮小。美國公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到2006年底，美國貧困人口有3650萬人，幾乎相當於每八個美國人中就有一人生活在貧困中。美國家庭組織稱，實際上，在65歲以下的美國人中，有近九千萬人在2006~2007年之間（或其中某些時間段）沒有醫療保險，佔總數的34.7%。<sup>57</sup> 透過此類事實和數據，我們還能夠說美國的民主制度是我們應該仿效的普世民主嗎？

西方強國的壟斷資本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有時在國內的選舉中，甚至在表面和形式的選舉程序上，所謂的民主與公正都會被拋棄，而顯現出制度上的“獨裁”和“霸道”。讓我們以英國1979年的大選為例：英國為了防止各個小黨派聯合執政，在其選舉制度上就做出了極其不平等的規定。保守黨只需四萬張，工黨只需4.2萬張選票即可獲得一個議員的席位，而其他小黨聯盟則需40萬張選票才能獲得一個議員的席位，其難度相當於保守黨與工黨的十倍。<sup>58</sup> 現在，這一極不合理的狀況不僅沒有改變，反而有惡化的趨勢。我們也可以明顯地看出，國際壟斷資本為了進一步實現在全球的聯合，進而鞏固其在

---

<sup>57</sup>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7年美國的人權紀錄〉，新華網2008年3月13日，參見[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3/13/content\\_7779687.htm](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3/13/content_7779687.htm)。

<sup>58</sup> 應克復等著：《西方民主史（修訂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325頁。

全球的統治地位，它們已開始在全球範圍內削弱各國的多黨制，企圖推行壟斷資本內部的諸如美國十分成熟的兩黨制。

美國的總統選舉，不過是統治集團內部各個不同派別代表人物的角逐。在他們內部，有時會鬥得你死我活，甚至無所不用其極。尼克松在美國政壇上活躍幾十年，曾競選過聯邦眾議員、參議員、州長、副總統和三次總統。當他離開白宮之後，在其《領導者》一書中，談到競選中的黑暗時，曾轉引丘吉爾對政壇用語，三番兩次說，資本主義國家的競選“粗野而骯髒”。<sup>59</sup> 美國總統選舉中，骯髒內幕的極端，就是對競選對手的暗殺。1968年，羅伯特·肯尼迪參選被暗殺身亡。1972年，喬治·華萊士參選，被暗殺致殘。1974年，傑拉爾德·福特參選也曾被暗殺過。現在，一些預言家預言，不排除奧巴馬在任期內遭到美國極端種族主義勢力的暗殺。

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雖然許諾並且宣告政權屬於大多數人，但是它從來沒有實現過。它與封建制度相比，只是改變了經濟奴役的形式。封建制度是封建國家奴役制或依附農民租佃制，<sup>60</sup> 資本主義民主制則是僱傭奴隸制。只是後者對其奴役作了特別漂亮的裝飾，但並未改變也不會改變這種奴役的實質。

有人說，實行美國式的民主制度，貧窮國家的經濟就能得到大發展。美國經濟學家瑟羅曾統計了從1870~1988年這128年的歷史跨度中，按人均GDP計算，全世界前20名最富裕國家排名幾乎沒有變動，而只有一個日本躋身其中。<sup>61</sup> 瑟羅沒有談到，即日本的崛起，其主要原因是美國為冷戰之需要，在東亞培植同盟的結果。現在世界上有220多個國家和地區，除極少數社會主義國家外，其餘幾乎都是按照西方民主制在搞資本主義和所謂新一輪的“民主化”。但比較富裕的依然

---

<sup>59</sup> 理查德·尼克松：《領導者》，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第386頁。

<sup>60</sup>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典型的封建制度要為民作主，而不是由人民自己作主。

<sup>61</sup> 萊斯特·瑟羅：《21世紀的角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213~214頁。

是那 20 幾個國家，其餘 190 多個國家和地區不僅面貌依舊，甚至更加動盪頻仍和貧窮有加。即使西方的民主制，在他們自己的金融甚至經濟危機面前，也顯得蒼白無力，這是我們認識西方民主制所謂“優越性”的絕妙教材。

有人說，實行美國式的民主制度，就可以有效地防止腐敗。陳水扁的民進黨靠反國民黨腐敗上臺，但陳上臺之後，洗錢橫跨全球，比國民黨更有過之。意大利曾經是三屆總理 361 個內閣成員全部都是腐敗分子。在所謂最“民主”的美國，前幾年因黨派之爭，美國國會山上遊說集團涉及到政府腐敗內幕的冰山一角，但一旦發現繼續揭露將可能傷及美國政體乃至國體，這剛剛開始的相互揭露便嘎然而止。在現代金融高度壟斷的資本主義社會，現代金融隱匿運行加上經濟高度虛擬，在客觀上造成普通百姓與現代大資本所擁有的信息會越來越不對稱，大資本侵蝕普通百姓權益的腐敗現象會愈加容易發生。所謂“實行民主之初腐敗難以避免，待民主逐漸穩定後必然清廉”說，也是沒有道理和不符合事實的。

還有人說，實行美國式的民主制度，國家就不會分裂。蘇聯按照西方開出的方子實現了所謂的民主制度，結果分裂為 15 個國家。2008 年 2 月，科索沃在西方國家支持下，剛剛從塞爾維亞獨立出來。

所謂實行美國式的民主制度，經濟就能得到大發展、可以有效地防止腐敗、就能防止國家分裂等等，無非是想進一步論證美國民主制的普世性。

## 五、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推行民主及自由、 人權等戰略的由來、實質和後果

在我國，名實之爭已有幾千年歷史。看問題，不能僅聽名詞如何。舉個可能不太恰當的例子，美國最大的國家擔保的非銀行住房抵押貸

款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僅從名字上聽，很動人。但其所經手的抵押貸款總額為 5.3 萬億美元，幾乎佔美國住房抵押貸款總額的一半，絕大部分貸款無法回收，這是引起美國金融危機的主要禍根之一。“民主”、“自由”、“人權”等等，這些語詞聽起來也很動人，但這些語詞的本身並沒有什麼階級性，而使用這些語詞不同的人、階級、利益集團或國家，往往是站在不同的立場上，賦予了它們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含義。所以，在政治哲學領域和民主政治理論方面，我們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常使用的一些詞句和用語，首先不要犯過去“左”的錯誤，一切都草木皆兵，一概予以批判和排斥；但也不能完全放鬆警惕，不作任何分析地全盤照抄照搬，陷入西方主導的話語體系之中。我認為，正確的態度應當是，進行深入研究和辯證分析，弄清其確切含義，然後再確定哪些可以直接借鑒和使用，哪些需要加以辨析和改造，哪些需要拒斥和抵制。特別是對“民主”、“自由”、“人權”等這樣一些基本概念，我們更要如此。在這些基本概念的具體內涵裡，實質上都直接或間接地涉及資產階級或馬克思主義的所有重大基本理論。

長期以來，美國是我們這個地球上最大的經濟、政治、文化、科技和軍事實體，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一些話語體系也往往是由美國發明、主導與壟斷。對於這一點，我們必須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讓我們回溯一下資產階級民主、自由、人權理論的起源及發展歷程，這將有助於我們認識當今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人權的理論，也在於認識所謂“民主的普世性”。

可以說，以美國為首的當今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人權理論，是對自由資本時代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等理論的繼承和發展。自由、平等、博愛，是 18 世紀法國資產階級在其革命時期提出的政治口號。實質上，這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中自由貿易、等價交換原則在政治領域中的反映。當時，這一口號對擺脫封建王權和

神權束縛、爭取政治自由、民主平等具有重大意義。它不僅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起到了號召、激發、團結革命群眾向封建統治發動進攻的作用，而且產生了廣泛的世界性的影響。但是，這一口號也具有很大的階級局限性，它本身也是不真實、不科學的。因此，馬克思在指出“自由、平等、博愛”這一口號具有反封建的進步意義的同時，總是不斷地指出這一口號的極大欺騙性，指出這一口號的實質是資產階級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是為了保護和擴大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鞏固資產階級所賴以生存的政治和經濟制度。

隨著自身的不斷發展壯大，各國資產階級相繼走上了侵略擴張之路。它們在擴張領土、建立殖民地、拓展利益範圍的同時，也進行著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擴張。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思想觀念，以及由此制定的資產階級政治和經濟制度，也隨之走向世界。

美國是上述侵略擴張行為的後起之秀。對外進行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滲透，並不僅僅是美國某些統治者的特殊癖好，而是有著其深厚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根源。絕大部分的美國人都自稱或都是基督徒。艾森豪威爾曾說：“承認上帝的存在是美國精神的第一個也是最基本的一個表現。沒有上帝就不會有美國式的政體，也不會有美國的生活方式。”<sup>62</sup> 在全世界流通的美元貨幣上，也印著“我們相信上帝”這樣的語句。所以，除了華盛頓第二次就職時的兩段簡短演說以外，幾乎所有美國總統的就職演說都談到了上帝。這從根本和實質上說，所謂“上帝”，就是為美國資產階級壟斷集團根本經濟利益和國體、政體服務的奴僕，這是美國國家意識形態的一個顯著特點。其另一個特點是，美國各階層也都深信美國是“新的耶路撒冷”，美國人是“上帝的挑選”和“天之驕子”，承擔著上帝賦予的把他們自己的價值觀與政治制度推廣到全球的神聖使命。

---

<sup>62</sup> 塞繆爾·亨廷頓著，程克雄譯：《我們是誰？》，新華出版社 2005 年，第 87 頁。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總統威爾遜便宣稱：“‘民主’是一個重要的指導原則，因為它代表著一種全新的國內秩序，由此當然也能普及於國際秩序”；“新的自由民主”將是美國“重要輸出品之一”；要“確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無阻”。<sup>63</sup>

二戰結束後，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喬治·凱南和國務卿杜勒斯先後提出“和平演變”的理論，但美國當局重視不夠。美國在經歷主要運用“硬實力”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失敗之後，便進一步知曉“民主、自由、人權”等“軟實力”的重要性。

美國對外戰略從崇拜“硬實力”到著力運用“軟實力”的轉變是被迫的。這一轉折發生在尼克松政府時期。1968年年底，尼克松當選為美國第37屆總統。此時的美國在世界上30個國家駐軍一百萬，對全世界近一百個國家提供軍事或經濟援助。特別加上已陷入近六年的越南戰爭，使其財政經濟狀況逐漸衰落，國際收支發生危機，美國不堪重負。1969年初，尼克松在其就職演說中說：“經過一段對抗時期，我們正進入一個談判時代”，“歷史所能賜予我們的最大榮譽，莫過於和平締造者這一稱號”，“我們邀請那些很可能是我們對手的人進行一場和平競賽”。<sup>64</sup> 嚴峻的形勢迫使尼克松政府採取“和平競賽”即“和平較量”的三項重大舉措，一是決定與新中國關係逐步實現正常化；二是逐步從越南撤軍；三是結束布雷頓森林金融體系，放棄固定匯率制度，放任美元充當國際貨幣。可以說，這三項“和平較量”的舉措，是美國運用其“軟實力”拯救和重振美國霸權地位的關鍵之舉。從一定意義上講，結束布雷頓森林金融體系，放任美元“自由”的充當國際貨幣，對長達幾十年的美國經濟繁榮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尼克松雖因“水門事件”於1974年辭職，但他的繼任者福特卻

<sup>63</sup> 孔華潤主編：《劍橋美國對華關係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第40頁。

<sup>64</sup> 〈理查德·尼克松第一次就職演講（譯文）〉，東方博客2006年3月25日，參見<http://chouky.blog2.cnool.net/Article/2006/03/25/197380.html>。

繼承其思想遺產。1975年7月底，35個國家（33個歐洲國家加上美國和加拿大）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召開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通過了歐安會最後文件，又稱《赫爾辛基協定》。該協定是美、蘇緩和與妥協的產物，兩國的政策目標在協定中都得以實現。《赫爾辛基協定》規定，二戰後形成的歐洲邊界現狀不可破壞，這就意味著美歐對蘇聯“硬實力”的承認，但同時美歐也提出了蘇聯要對西方“軟實力”即“人權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道德、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尊重”，並擴大東西方陣營的人員往來。對蘇聯而言，這實質上是把美國利用所謂“人權”等問題干涉蘇聯內政、支持和扶植蘇聯社會內部的反對勢力以合法化。至此，西方國家利用協定中規定的條款，給予蘇聯“持不同政見者”以多方的支持。這種支持有物質和金錢的，也有“榮譽”和所謂“道義”的。在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這就為日後蘇聯解體和蘇共垮臺打開了一條關鍵的通道。

1977年卡特政府上臺後，則把“人權”明確作為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並以所謂維護“人權”的名義，大肆干涉別國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內政。

冷戰結束後，美國稱霸全球成為可能。處於冷戰向後冷戰過渡時期的老布什，對美國“對外人權理論”作了“創新和發展”。布什說：“促進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的發展，作為人權以及經濟和社會項目的最可靠的保障”。<sup>65</sup> 1989年1月20日，布什在其第二任就職演說中強調：“我們的願望多過了我們的錢袋子，但我們需要願望”。這一矛盾如何解決，布什又說：“如果美國不致力於高尚的道德原則，那她就永遠不是完整的美國。今天的美國人民有這樣一個目標，那就是讓國家的面孔更和善，讓世界的面孔更慈祥。”<sup>66</sup> 此後，布什政府把支持民主和鼓勵市場經濟作為他們對外政策所追求的兩個目標。

<sup>65</sup> 周琪：《美國人權外交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頁。

<sup>66</sup> 丹尼爾·B·貝克：《權力語錄》，第105頁。

蘇東劇變、蘇聯解體，充分說明了“民主、自由、人權”等“軟實力”對於美國實現其戰略的極端重要性。

克林頓政府上臺後認為，卡特政府的人權政策是以個人為目的的，而冷戰結束後，則應當從民主這個更基本層面上促進人權。據此出發，克林頓政府即把提高美國安全、發展美國經濟與在國外促進民主作為國家安全的三大目標，從而進一步明確把在國外促進民主上昇到了國家安全戰略的高度。

為適應美國推行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的需要，歷經老布什和克林頓兩任政府對其實踐認識的昇華，美國政府及學者的主流對人權的定義也就作了實質性的修改，“人權屬於主權範圍內的事務”的觀點逐漸讓位於“人權高於主權”的主張。因此，在冷戰結束後，人權則更進一步被看作是美國在全世界推行民主戰略的一個重要工具。

應該看到，冷戰結束後，新一輪更大規模的經濟全球化席捲全球。這就使得為競爭自由、貿易自由和金融自由服務的“民主”、“自由”、“人權”和“新自由主義”表面具有了更廣泛的所謂“普世性”。因此，也就重新喚起了美國對“硬實力”的崇拜。結果，美國在海灣、南聯盟、阿富汗和伊拉克接連打了四場較大的局部戰爭。前三場，較為順利，第四場開始也十分順利。2002年1月20日，小布什在其第一個任期剛剛就職時，頗具“血氣方剛”之勢。他在就職典禮上說：“美國有強大的國力作後盾，將會勇往直前”；“如果我們不領導和平事業，那麼和平將無人來領導”。<sup>67</sup>此時的美國，想通過“硬實力”“讓大家分享”“民主”，結果碰得頭破血流。

崇拜“硬實力”的教訓，使得小布什回歸到對“民主”等這類“軟武器”的重視。從一定意義上講，“軟武器”的傳遞者是曾因從事協助蘇聯猶太人偷渡以色列而被判處九年監禁的原蘇聯猶太人納坦·夏蘭斯基，他曾是當年很“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夏蘭斯基寫

<sup>67</sup>〈布什第一任總統就職演講全文〉，百度博客2007年12月12日，參見<http://hi.baidu.com/2007fei/blog/item/05dbe40f24da15eeab6457fd.html>。

過一本名叫《論民主：以自由的力量征服暴政和恐怖》的書。書中宣揚的主要觀點是，世界分為兩大類：一個是“自由社會”，一個是“恐懼社會”；前者是“推動和平的力量”，後者是“戰爭與恐怖的根源”。民主是一種普世價值，只要可以選擇，沒有任何一個民族的人民會選擇生活在獨裁者的統治下。“恐懼國家”、“專制政權”不能靠自身的變化走向民主，西方國家必須把西方價值觀的理想與西方國家的外交政策、經濟援助掛起鉤來，才能取得“勝利”。為了自由世界的安全，應採取任何必要手段來支持民主。夏蘭斯基在書中一開始就開宗明義地寫道：“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有些人稱為的‘第四次世界大戰’，我們必須重振曾幫助我們不發一槍一彈贏得上次世界大戰的鮮明道義”。據說，布什在第一任期即將結束之際拿到該書，嗣後便如飢似渴地閱讀，讀後對本書闡述的觀點大加稱讚：“如果你想搞清楚我在外交政策上的想法，你該去讀讀夏蘭斯基的書，這傢伙可是個英雄人物，這真是一部偉大的著作”。<sup>68</sup> 夏蘭斯基還被邀請到白宮做客，布什也把此書推薦給國務卿賴斯，以至這本書在白宮和美國政界軍界迅速走紅。這使美國的政治家們頗有一種迷航之舟得到羅盤的感覺，使懵懵懂懂的單邊主義亂闖一下子獲得了“精神的指導”和“震動後的動力”。

看過該書後，布什還立刻對他的第二任就職演說和國情咨文做了修改。2005年1月20日，布什在僅有20分鐘的第二任期就職演講中就塞進了40多個“民主”、“自由理念”、“民主權利”、“自由世界”等字眼。他說：“我們已明瞭自身的弱點，我們也深知其根源”；“我們受常識的指引和歷史的教誨，得出如下結論：自由是否能在我們的土地上存在，正日益依賴於自由在別國的勝利。對和平的熱切期望只能源於自由在世界上的擴展”；“有鑒於此，美國的政策是尋求並支持世界各國和各種文化背景下成長的民主運動，尋求並支

---

<sup>68</sup> 劉見林：〈評《論民主：以自由的力量征服暴政和恐怖》〉，360doc網2007年6月15日，參見<http://www.360doc.com/showWeb/0/0/560102.aspx>。

持民主的制度化。最終的目標是終結世間的任何極權制度”；“那些面對著壓制、監獄和流放的民主變革的參與者應該知道，美國知道你們的潛力：你們是自由國家未來的領袖。”<sup>69</sup> 美國等西方國家主要以“民主、自由、人權”作武器、僅花費了 46 億美元便在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坦“成功改造”中亞三國的實踐，使得美國更加重視“民主、自由、人權”等軟實力。

2008 年 8 月 7 日，美國總統小布什在動身參加北京奧運會之前，在泰國曼谷就美國對亞太國家和地區的態度發表講話時說：“我已通過明確、坦率和一貫的方式告訴中國領導人，我們高度關注宗教自由和人權”，“美國認為中國人民應該享有基本自由，這是全體人類的天賦權利”，“我對中國的未來表示樂觀。在商品自由交易的環境下成長的年輕人最終會要求交流思想的自由，尤其是在不受限制的因特網上自由交流的思想”，“最終，只有中國才能決定它將走什麼樣的道路。美國及其夥伴採取現實的態度，為各種可能性作好準備”。<sup>70</sup>

美國等西方國家拚命對外推銷其民主、自由、人權等思想觀念，說到底，仍然是為了維護和擴大它們的經濟和政治利益。

二戰結束以後直至 20 世紀 70 年代初期，西方世界有一個所謂黃金時期。這一時期，發達國家作為整體，年均經濟增長高達 4.4%，其後 20 年（從 70 年代初到 90 年代初）的年均經濟增長率 2.2%。這使經濟學界產生過很多樂觀想法，例如勞資矛盾解決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週期被熨平了甚至是消失了，經濟將實現自動和無限的增長。這就形成一個奇怪的循環，各國出口賺美國人的錢，然後又購買美國股票和債券，借錢給美國人花，美國人花錢又支撐了美國和各國經濟的增長。美元源源不斷流向世界，世界又把美元送回美國的債市和股

---

<sup>69</sup> 〈布什第二任總統就職演講全文〉，百度博客 2007 年 12 月 12 日，參見 <http://hi.baidu.com/2007fei/blog/item/a877d18f0ccfe6f9513d92f8.html>。

<sup>70</sup> 〈美國總統布什 8 月 7 日在泰國曼谷的講話（全文）〉，哲學人生網 2008 年 8 月 8 日，參見 [http://bbs.zxrs.net/dispbbs\\_61\\_115131\\_1.html](http://bbs.zxrs.net/dispbbs_61_115131_1.html)。

市。1948年，全球國際儲備為478億美元，到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解體前的1970年增長到932億美元，22年間年均增長3%。從1971年初的932億美元，增長到2007年年底的64892億，其間37年增長約70倍，年均為12%。而與此同時，全球GDP僅增長16倍。過去十年，美元貨幣印刷總量超過過去40年印刷總量，全球官方儲備增長更是達到了驚人的兩倍之多。面額為一百美元的一張紙鈔過去印刷成本為三美分，現在為六美分。美國用三或六美分的成本，到海外購買一百美元的東西，發展中國家拿到這一百美元，還捨不得花掉，往往又反存到美國。自1994年以來，美國貿易逆差逐年升高，1999年達三千多億美元，而2006年對外貿易赤字已攀升到8830億美元，經常項目赤字8567億美元；1980年，美國財政赤字為762億美元，而從2008年10月開始的2009財年預算赤字將高達4820億美元。這就是美國長期以來能夠張著大嘴吃世界的根本奧妙。美國當局總是把這一現象解釋為美國民主制度的優越，以進一步維持他們金融帝國的統治。

以美國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和他們所鼓吹的民主及自由、人權和新自由主義，也造成了全球範圍內貧富的極端懸殊與國家民族的分裂。現在世界上最富有國家的人均收入比最貧窮國家的人均收入高出330多倍；世界南方欠世界北方的外債總額已經從1991年的7940億美元急增至目前的三萬多億美元，短短十多年，翻了四倍多。根據聯合國《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數據，現在世界上最富有的五百人的收入總和大於4.16億最貧窮人口的收入總和。通過民主及自由、人權與新自由主義等手段，最終弱化第三世界國家，是西方強國最基本的戰略手法。一戰結束時，世界上有30多個國家，二戰結束時，世界上50多個國家。冷戰期間，特別是冷戰結束後，現在世界上有220多個國家和地區，世界仍在分裂。可以說，美國拚命對外宣介和推銷民主、自由、人權，竭力西化、分化世界，以進一步鞏固其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從經濟上掠奪世界的目的正在實現。

但是，美國採用的空手（美元）套白狼（物美價廉的商品）的戰略，是不可能長久維持下去的。如此下去，美國的債務越來越多，貿易逆差越來越大，世界經濟的總需求越來越低迷。這一惡性循環的惟一可能結果，就是一場世界經濟大蕭條。人們常常混淆市場經濟與新自由主義的關係，以為一國範圍內無障礙市場經濟行得通，國際範圍內的無障礙市場經濟也應該行得通。然而一國範圍內的市場經濟成功的前提，是政治上的一人一票可以制約經濟上的一錢一票，使該國的地區差距與貧富差距得以有效調節，有足夠的財政資金建設道路、橋樑、港口、機場，能實施內在協調一致的經濟和民事、刑事法律，並且可以用凱恩斯主義的財政與貨幣政策調節經濟週期。失去這一前提，市場經濟將帶來兩極分化，假冒偽劣盛行（劣幣驅逐良幣），經濟動盪、秩序混亂，以致社會無法存在下去。在缺乏一個由全世界人民投票選舉的世界政府的前提下，在跨國公司不受民主力量制約的前提下，拆除各國對本國經濟的保護，取消各國的經濟主權，聽任弱肉強食的經濟邏輯無障礙通行，只能導致世界範圍的兩極分化和社會動盪。從 2008 年 9 月開始的美國金融乃至經濟危機，現在不正是在全球範圍內蔓延嗎？

## 六、對關於民主的幾個問題的思考

### 1、民主是目的還是手段

恩格斯說：“無產階級為了奪取政權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對無產階級來說，這種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樣，只是一種手段。但是，如果在今天，有人把民主看成目的，那他就必然依靠農民和小資產者，也就是依靠那些正在滅亡的階級”。<sup>71</sup> 毛澤東說：“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

---

<sup>71</sup>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 卷，第 662 頁。

民主屬於上層建築，屬於政治這個範疇。這就是說，歸根結蒂，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sup>72</sup> 在國家範疇之內講民主，民主就是國家，就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和手段，民主是手段，是政體，是國家形態，專政是目的，在這裡民主的本質是專政，是政治制度，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專政。在黨內講民主，民主是手段，是作風和方法，集中是目的，在這裡，民主的本質是集中制，是為了集中正確意見。在這裡，民主集中制不是什麼“政治制度”，而是黨的組織原則，黨內沒有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專政。

有觀點認為，民主只是手段。民主既然是一種國家形態，那麼按照歷史唯物主義原理，上層建築要為自己的經濟基礎服務，民主屬於上層建築範疇，它依附、作用於一定的社會經濟，歸根結底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民主是統治階級用來達到自己基本目的的一種手段。當然，民主這種手段是要達到一定目的的，沒有目的，這種手段也就失去其作用，但不能把民主的目的性誤認為民主就是目的。

另一種意見認為，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理由是，民主不是一個狹小的概念，民主的性質、作用和與社會生活各方面所發生的必然聯繫，決定了它具有多方面的含義；馬克思主義也是從各種角度、多種意義來考察和解釋民主的含義的。比如，民主是一種國家制度；民主是無產階級人民群眾享有的管理國家的權利；民主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民主是共產黨的工作作風，等等。由此可見，“民主只是手段”的論斷是從一定角度出發，就民主的某一種意義而言的。如果從無產階級解放世界的歷史使命出發考察民主，就可以看出民主也是目的。民主是手段和目的的有機統一。作為手段，民主體現了自身所包含的工具性價值；作為目的，民主則是人們對生存理想狀態的一種價值追求。

---

<sup>72</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321頁。



## 2、民主是國體還是政體

其一，政體論。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裡，雖然沒有直接地給民主下過定義，但他們是把民主看作一種政體的。1891年，恩格斯在〈愛爾福特綱領批判〉中明確指出：“如果有什麼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sup>73</sup> 恩格斯在這裡所說的“政治形式”，就是指政治統治形式，也就是政體。在這裡，恩格斯不僅把民主共和國當作了一種政體，而且把建立這種民主的國家政體看作是無產階級取得政治統治的前提。也就是說，無產階級只有建立了民主的政治形式並使這種政治形式正常運轉的條件下，才能說無產階級真正取得了政治統治。由此可見，恩格斯也是在國家形式即政體的意義上使用民主這個概念的。

其二，既是國體也是政體。列寧曾明確指出：“民主是一種國家形式，一種國家形態。”列寧說的“國家形式”即政體，“國家形態”即國體，都是指國家政治制度。民主作為國體，是指這個國家的階級實質，即它是屬於哪個階級的，是哪個階級在國家中掌握政權，佔據統治地位。這是和專政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民主作為政體，是指在國家中佔據統治地位的階級採取何種政權形式來管理國家，實現自己的統治。作為政體的民主，是專制獨裁的對立面。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是國體和政體的統一。從國體來說，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是對人民實行民主和對敵人實行專政的統一，現階段的民主制度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制度。從政體來說，是全體人民通過自己選出的代表組成國家機關，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力。

## 3、民主與少數服從多數是不是一個東西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明確指出：“民主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不是一個東西，民主就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國家”二字特別用黑體字予以強調），即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一部分居民對

<sup>73</sup> 〈愛爾福特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74頁。

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統地使用暴力的組織。”<sup>74</sup> 黨內民主和國家民主本質上不是一個東西，因此不論是直接民主還是代表民主，兩者仍然不是一個東西。同名同姓的人有的是，難道就是一個人嗎？民主和民主價值觀念不是一回事。少數服從多數是民主的基本原則，但不是民主的全部，民主不等於簡單的“少數服從多數”。在許多人心目中，所謂“民主”，就是“投票”，就是“少數服從多數”。但是，“民主”是一整套社會制度的一部分，而且絕不只“少數服從多數”一條。民主對於它的主權者之間是非暴力的，民主制度本身設計了定期改選等自我糾錯機制。

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實質是決策主體行動的原則，不是思想的原則；是決定行動方案，不是討論思想統一。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的價值取向是“合理”，而不是“正確”。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最精彩部分是民主討論的過程，民主原則的精髓是尊重不同意見。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是具有適用邊界的，並不是所有場合都適用，更不能泛化。因此，在貫徹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中，必須要尊重保護少數。我們現在視為常識的思想，往往是前輩無數經驗乃至流血教訓的反復積累。在我們的實際生活中，有時往往是錯誤走得很快，真理常常落到錯誤的後面。在古雅典的民主中，曾把主張太陽是團燃燒的物質，月亮光借自太陽，並提出月食的正确理論的優秀哲學家、科學家阿那薩哥拉先是監禁，後又流放；也曾在公衆法庭上，以 281 對 220 票通過，把著名的哲學家蘇格拉底判處了死刑。通過民主的方式，對真理宣判死刑的歷史沒有終結。我們要儘量避免這種悲劇重演。

#### 4、民主的形態

根據摩爾根的研究，在原始社會，有過氏族社會民主制事實上的存在。這種民主制與進入階級社會後的民主制有著根本的不同。如上所述，恩格斯曾明確肯定原始社會有過“古代自然形成的民主

---

<sup>74</sup> 〈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第184頁。

制”。<sup>75</sup> 列寧也明確肯定過人類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原始的’民主制”。<sup>76</sup> 但列寧又說過：“發展的辯證法（過程）是這樣的：從專制制度到資產階級民主；從資產階級民主到無產階級民主；從無產階級民主到沒有任何民主。”<sup>77</sup> 列寧說：“國家的消滅就是民主的消滅，國家的消亡就是民主的消亡”。筆者認為，從廣義上講，人類社會產生依賴的民主可分三種形態：一是原始社會民主，二是國家形態民主，三是未來共產主義社會民主。三者都有其特殊性，因此構成了不同形態的民主。第一、第三種民主，形式上更有相似之處，是全部落或全社會所有成員之間都有平等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利，因而可以說是“完全的民主”。我們現在經常說的民主，主要是指第二種即國家形態的民主，在國家形態的民主中，有奴隸制民主、封建制民主、資本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通常所爭論的，主要是資本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民主。上述民主，都不是全體成員的民主，因而也都是“不完全的民主”。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是奴隸制民主、封建制民主、資本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的“共性”。

馬克思主義認為，狹義的民主首先是一種國家形態。國家形態的民主是統治階級的政治國家的民主，就是對統治階級內部實行民主，而對被統治階級實行專政的民主。在以往剝削階級佔統治地位的國家裡，民主制度都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之上的，其實質在於確認和保障剝削階級即統治階級在國家生活中的主體地位及其各種權利，是佔人口極少數的剝削階級的民主。奴隸制民主的實質是奴隸主階級的民主，封建制民主的實質是地主階級的民主，資本主義民主的實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

在社會主義社會裡，情況則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由於建立了以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和基本特徵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建

---

<sup>75</sup>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03頁。

<sup>76</sup> 《列寧選集》第3卷，第148頁。

<sup>77</sup> 《列寧全集》第31卷，第156頁。

立了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不僅成了生產資料的主人，而且成了國家和社會的主人。社會主義國家是民主國家。社會主義民主是“更高類型的民主制”。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和核心，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項公民權利，享有管理國家和企事業的權力。因此，毛澤東認為，就其實質而言，社會主義民主就是人民民主。社會主義在本質上是民主的。社會主義民主的核心內容和根本原則是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馬克思所主張的社會主義民主，就是這種國家不再是統治因素的真正民主，即社會形態的民主。社會形態的民主在原始社會就存在。在原始社會時期，還不存在作為國家形態的民主制度，但卻存在原始氏族社會形態的民主。社會形態的民主是以社會個人的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為基礎的；國家形態的民主是以代表人民公意的統治階級國家的自由為基礎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民主就是讓每個人都獲得自由的社會形態的民主，區別於以國家自由代替個人自由的國家形態的民主。現在我們常說的黨內民主、企業民主、村民自治、社區民主、學術民主、軍事民主等等，同樣也是非國家形態的民主。

當人類社會進入共產主義階段，完全消滅了僱傭勞動所有制關係，因而也就消滅了階級和階級統治的國家；隨著國家消亡時期的到來，國家形態的民主也會隨之逐步消亡。從那時開始，人類社會就只有社會形態的民主了。

5、“資產階級民主不具備普世性，社會主義民主或馬克思主義民主才具有普世性”。

這實質上是混淆了馬克思主義真理的普遍性與所謂階級民主的普世性的界限。馬克思主義揭示了客觀存在的自然界、人類社會與人的思維中最一般的規律，是對客觀存在的事物矛盾及其展開過程的把握，並且這些最一般的規律始終是隨著事物的不斷發展變化而不斷前進和發展著，這是無產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觀與方法論。無產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運用這一世界觀與方法

論，來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終目的，是要與一切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和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實現共產主義即每一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一具有鮮明階級立場的世界觀方法論，決不會為任何企圖維護剝削制度的資產階級所承認，更不會被他們所接受。

## 七、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 堅定不移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正確政治方向，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這是在深刻總結我國政治建設的實踐經驗、借鑒國外政治領域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作出的戰略部署。我認為，學習貫徹十七大精神，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促進經濟社會轉入科學發展的軌道，要重點在以下四個方面下功夫：

第一，在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中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堅持黨的領導，是提高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能力，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關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要保證人民當家作主，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一項十分宏偉艱鉅的事業，必須在最無狹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遠大的政治眼光和組織性的世界上最先進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即共產黨領導下，按照社會主義發展的客觀規律，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只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宗旨的共產黨，才能真正做到堅定地相信群眾，緊緊地依靠群眾，始終地為了群眾，充分地發揚民主，以最大限度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從而確保人民當家作主。實現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一個需要不斷發展、不斷鞏固的相當長的歷史過程。我國現在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這一歷史階段的國際環境和我國經濟與社會結構的條件

所決定，我國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和階層差別，各階級階層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礎上，也存在著一些不同利益和要求之間的矛盾。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堅持共產黨領導的重要性，還突出地表現在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從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正確處理社會利益矛盾，協調社會利益關係，正確全面地反映和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人民群眾的整體利益總是由各方面的具體利益構成的。在正確反映並妥善處理各種利益關係時，應認真考慮和兼顧不同階層、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但最重要的是必須首先考慮並滿足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要求，優先保證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工農基本群眾的利益。還需要強調的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全新事業，無論是在理論還是在實踐上，都具有極強的探索性。因此，只有在沒有任何私利的共產黨的統一領導下，才能高屋建瓴、審時度勢、統籌全局、把握方向，並結合不斷變化著的實際，正確處理黨和人大、政府、政協、群眾團體的關係，支持各方依法履行職能，做到總攬而不包辦，協調而不代替，積極穩妥地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此外，也需要進一步講清的是，我們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堅持民主集中制這一我黨我國的根本組織制度，但在黨和國家的各項實際工作尤其是在科學研究與學術探討中，我們在尊重多數的同時，要十分注意保護少數。搞“家長制”和“一言堂”並不是堅持黨的領導。

第二，緊緊依靠最廣大人民群眾當家作主。抗戰勝利前夕的1945年7月，毛澤東主席在延安與黃炎培那段著名的談話值得我們永遠銘記。黃炎培說，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週期率。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負起責來，才不會人亡政息”。<sup>78</sup> 20世紀50年代末

---

<sup>78</sup> 金沖及編：《毛澤東傳 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6 年，第 719~720 頁。

60年代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時說，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sup>79</sup> 他還說，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首先就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利來克服各種敵對勢力和它們的影響的問題。像報紙刊物、廣播、電影這類東西，掌握在誰手裡，由誰來發議論，都是屬於權利的問題。掌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手裡，絕大多數人民的權利就有保證了。這就明確地告訴我們，人人負起責來，就是人民群眾自己要為自己當家作主，而不是在人民範疇之外，選出另外一個管理集團。工人階級及其政黨，是人民群眾中最先進的部分。共產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是人民中的先進分子，而不是人民範疇之外的“精英集團”。堅決相信、緊緊依靠最廣大人民群眾當家作主與堅持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具有內在的高度的一致性，這才是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毛澤東關於人人負起責的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思想的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核心或根本目的是人民當家作主，而人人負起責來則是達到這一根本目的的根本途徑，舍此別無它途。從一定意義上講，社會主義事業惟其艱難，就是真正讓人人負起責來的艱難。

以鄧小平、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央第二、第三代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持和發展了毛澤東的上述思想。胡錦濤同志指出：“相信誰、依靠誰、為了誰，是否始終站在最廣大人民的立場上，是區分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分水嶺，也是判斷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試金石。”<sup>80</sup> 這一名言，我們也必須牢牢記取。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人民當家作主的最根本條件，是在經濟上當家作主。沒有這一條，其他民主權利都無從談起。

<sup>79</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9頁。

<sup>80</sup> 胡錦濤：《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上的講話（2003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頁。

所以，我們必須堅持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不動搖，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不動搖。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也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有力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健康快速地發展。我們還要支持人民代表大會依法履行職能，善於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職權，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的聯繫。要支持人民政協圍繞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履行職能，推進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制度建設；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完善民主監督機制，提高參政議政實效，發揮政協協調關係、匯聚力量、建言獻策、服務大局的重要作用。要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保證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權。要發展基層民主，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充滿活力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擴大基層群眾自治範圍，完善城鄉社區和企事業單位的民主管理制度，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要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完善決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統，增強決策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健全決策的制定和實施的規則和程序。總之，要通過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正確反映和切實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以不斷增強黨和國家的生機與活力。

**第三，正確實施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國是實現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的基本途徑和法治保證，意義重大。無論是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還是堅持和完善我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堅持和完善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都離不開社會主義法治。在當代中國，無論是黨的



領導還是人民當家作主，都必須得到法治的保障並在法治範圍內實施，嚴格依法辦事，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允許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因此，必須堅持依法治國這一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這三者是一個完整有機的統一體，缺一不可。需要指出的是，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辦事，是黨採用什麼執政方式開展執政活動的問題，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方式、方法和途徑問題，而決不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全部內容。我們應繼續充分重視和堅決貫徹依法治國這一基本方略，充分重視執政方式的重要性，但不能用“依法治國”這一單項要求，來替代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這三者有機統一以及三者中的其他兩項。不能僅講依法執政，而忽略以科學的思想、科學的制度、科學的方法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科學執政，忽略貫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堅持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的民主執政。

法律高於一切，是相對於任何個人和組織而言，但作為統治階級意志體現的法律，在我們社會主義中國就是為了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我們所做的一切包括所制定的法律，都是為了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當情況發生了變化，法律需要適應新的重大情況時，黨就要通過國家機關，通過一定的法律程序，及時地修改或廢除相關過時的法律，以更好地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所以，從根本上說，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需求和呼聲，是我們憲法和法律合法性的全部來源，也是其得以永葆活力的動力和源泉。要按照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尊嚴、權威。要堅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要推進依法行政，規範行政行為，健全政府職責體系，建立服務型、法治型政府。要推進公正司法，規範司法行為，保證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要深入開展法制宣

傳教育，弘揚法治精神，形成自覺學法守法用法的社會氛圍。要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證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一切政黨和社會組織，所有公民和社會團體，都必須以憲法和法律為準繩，自覺地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範圍內活動，牢固樹立遵紀守法的良好習慣。要不斷提高黨委、人大、政府、政協、法院、檢察院等黨政國家機關活動的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水平，儘快形成行為規範、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黨政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

毫無疑問，廣義的民主也是程序，是過程，是手段，是制度，但各種不同形式和性質的民主，必然都是為其不同的政治目的服務的。我們不能把程序和過程視為一切，而不談實行民主的目的或目標。不能程序、過程走完了，結果勿須問，去搞什麼“程序拜物教”。從表面和形式上看，不同民主的程序和過程本身，往往沒有什麼分別，但其本質和所要達到的目的則有著根本的不同，關鍵是看誰去運用、去達到什麼目的。資本主義民主的目的是要資本即少數人當家作主，無產階級或者社會主義民主的目的是要絕大多數的人民當家作主。依法、依規選舉的程序與過程，無疑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必須不斷加強和完善，而且要十分重視相關制度、法規的設計、改進與實施，以充分發揚民主，充分表達民意。但我們也要清醒認識到，這決不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全部。只有不斷促進經濟社會的全面進步，不斷提高人們的政治思想覺悟和文化水平，不斷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才能充分保障最廣大人民群眾正確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力，確保人民當家作主這一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的不斷實現。與此相輔相成，確保了人民當家作主這一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的不斷實現，也有助於促進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最終目標的達到。

**第四、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載體。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政治體制改革也已取得一系列成就，社會

主義民主政治已顯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和優越性。現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有著不少有利條件，我們仍要繼續堅定不移地推進。但也要清醒看到，政治體制改革涉及黨的領導、政治思想、政治制度、行政管理、法制建設等方方面面，是一個內容廣泛的系統工程，需要我們進行長期的努力。任何民主政治的發展都又從根本上受制於一定社會的經濟和文化發展水平。我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就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是一個逐步發展的歷史過程。此外，政治文明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是對各個不同階級、階層、集團、群體乃至個人利益關係進行調整的過程。我國有著地域廣闊、人口衆多、各民族各地域經濟文化發展差異較大等特殊國情，等等。這都需要我們在黨的領導下，一切從我國國情出發。在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中，既要有時代的緊迫感，解放思想，勇於創新，又要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有科學審慎的態度和穩妥求實的精神；既要大膽借鑒人類文明優秀成果，又決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應根據我們的實際情況，來決定我們改革的目標、內容、方法和步驟，從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這一社會主義民主本質的實現。也只有這樣，才能既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勇於變革、勇於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使我國的政治制度更加完善，政治生活更加充滿活力，又能保持全國的集中統一，保持我國社會的政治穩定，推動我國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我們的黨、國家和人民已歷經了種種磨難，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無論是在當代世界還是在當代中國，歷史自身都加快了前進的步伐。我們深知，在階級和有階級的社會裡，特別是在目前以美國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裡，對民主與普世民主的探討、爭論甚至較量都不會終結。可以斷言，在階級和國家存在著的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不會有一個統一的答案。但歷史自身的發展終將會給人們一個滿意的答復。我們對此應深信不疑。我們也堅信，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引，在貫徹落實科學

發展觀中，我們也必將能夠及時抓住各種大好機遇，正確應對任何嚴峻挑戰，巍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和優越性，有著無比美好的明天。